

李峪出土銅器及其相關之問題*

高去尋遺著**

中國學者研究中國青銅時代極具特色的青銅禮器，素有長久的傳統，但多集中在中國境內青銅器的轉變，對於境外的影響或關係則很少注意。本文利用一九二三年山西北部渾源縣李峪村出土的一批銅器，討論其性質，尤其針對西方學者提出的司克泰西伯利亞藝術 (Scytho-Siberian Art) 與中國文物的關係，加以解答。

本文先確定所謂的李峪銅器，外國學者已著錄者計19件，留在中國而見諸報刊者19件，共38件，作為本文討論的基本資料。第二，分析這批青銅器的功能，作者駁斥西方學者當時流行的秦始皇祭祀恒山之說，而肯定是墓葬殉物，但不認為屬於趙武靈王之遺物。第三論述銅器形制和文飾的特徵，掌握這批青銅器的基本定位——與殷商西周截然不同，非春秋中葉以前之物。第四部分根據新鄭鄭墓和壽縣楚墓的出土物，推定李峪墓葬當在西元前四、五世紀之間，器物大抵也屬於這個時代。最後討論所謂司克泰和南西伯利亞等外來文化的問題，作者雖然不像西方有些學者過分強調李峪銅器出自司克泰西伯利亞藝術，不過他從銅器裝飾的繩紋（包括紉紋、糾紋和辯紋），承認中國銅器顯然受到歐亞草原上文物的影響。

* 高先生原稿前記云：

本文乃二十四年六月在母校求學時所寫，去今雖已四載，然余之管見仍無若干改動；唯於李峪銅器所受外來文化影響之問題，先是以其少許文飾可見於諸多屬於 Scytho-Siberian Art 之遺物中，後者又有若干器物作成之時代確早於前者，因疑前者之有此當受後者之影響，但此有關於當時中國全部文物之文飾問題，未敢立作堅強之斷言，今日則於文內改為肯定之語氣。此種見解之改變實發生於讀高本漢 (B. Karlgren) 近著之 "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 (載瑞典《遠東古物館雜誌》第九期，1937出版) 一文之後。又寫作本文之時，曾蒙導師傅孟真先生諸多指教，今日付梓前，又承梁思永師審閱一遍，並此深致謝意。二十七年十二月作者附識於昆明棕皮營村。

** 本文經杜正勝整理，凡整理附註皆加「*」等符號或「正勝按」，以與原稿區別。整理者代作摘要，增補引用書目，重編附圖，注明出處，以便查核。附圖參酌梅原末治的《戰國式銅器の研究》、《歐米菟儲支那古銅精華》以及其他相關書籍，部分圖版承蒙上海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惠允刊印，特此致謝。整理者並作後記，略述原委及此文在學術史與當今研究的意義，以供讀者參考。

- | | |
|----------------|-------------|
| 一、引言 | 七、年代之比定 |
| 二、遺物及其出土之時地 | 八、外來文化影響之問題 |
| 三、遺物非秦器之再辨 | 九、結語 |
| 四、遺物出於墓葬說 | 引用書目 |
| 五、遺物屬於趙武靈王說之商榷 | 英文摘要（杜正勝） |
| 六、銅器形制文飾之特徵 | 整理後記（杜正勝） |

一、引言

中國古代之銅器，於歷代著錄內，大都從形式上分爲殷周器與漢器兩大類。此種分類本創自宋《博古圖》而爲歷代學者所沿襲，即近世外人之治斯學者，亦多宗此準繩。然吾人如就實物對照觀察，每覺前者大都器形極端嚴肅莊重，而飾以所謂饕餮夔龍等諸多奇特之圖文；後者器形則具輕快意味，質地亦薄，且多數無文飾，其具文飾者亦與前者完全異趣。如更據學術上之考察，則覺此種分類似太粗疏，因此二者間之作風既有顯著之不同，其工藝上之演進似太突然。故何以如彼之「殷周式」一變而爲如此之「漢式」，其間有無過渡式之存在，如有之則此過渡式又將何似，乃成爲過去學者間最注意之問題。實則所謂「殷周式」與「漢式」之間，有一段過渡期之文物，於歷代著錄內或列於周或列於漢。此種漫無標的之區分，影響學術上之研究頗鉅。否則如羅斯陀夫柴夫 (M. Rostovtzeff) 所著《漢代之鑲嵌銅器》(*Inlaid Bronzes of the Han Dynasty*) 即不致將少許可斷爲過渡期物者盡屬之漢器矣。近十餘年來國內古器物學日漸發達，已知注意器物形制文飾之研究，而去年出版之著錄內仍有曰周某某器、漢某某器者。此種著錄歸屬器物之年代，雖大體上已較古人之錯誤爲少，然終未出其心目中的標的以告人。近來外人雖有將此過渡期物命名爲「秦式」者，然此種名稱之出發點即根本錯誤，且其所屬之時代亦無清楚之分界。前年 (1933) 在瑞典京城開第十三次藝術

史國際會時，瑞典學者曾將中國出土銅器，外人稱為「秦式」者，更名為「淮式」(Huai Style)，¹ 其時代約定自公元前七世紀或六世紀，至公元前三世紀。此種據藝術史之目光，於具有千餘年歷史之中國古銅器內，更劃出一新形式，歸屬於一時代內，固已較歷代之著錄為進步，又稱此一新形式為「淮式」，亦較「秦式」稍恰當；然其於學術上之價值如何，尚待精細之研究。至於「淮式」之時代，似當更有清楚之分界，至少其終止之時，是否完全包括公元前三世紀，或尚在以後，仍有問題。因吾人今日所知之淮式器物，其可確斷年代者，最晚亦不過公元前二二三年，此後秦始皇統一天下，及楚漢之際之銅容器，究竟屬何形式，仍為十餘年來學者間亟盼有所發見者。

近二十年來地不愛寶，古器物之出土幾乎日有所聞。吾人苟非健忘即當猶憶於新鄭發見古器物哄動全中國之年，亦適有李峪出土之一部份古器物悄悄流往國外。數年之後，即由歐陸播出「秦器」及「秦式」之呼聲。此種呼聲不啻於學術界中投以一極大之興奮劑。因當時一般學者，每以秦之年月最短，於文物上不能放何異彩；而此秦器之發見，實大震人聽聞。雖然此種發見未盡如外人之所期望，但於中國古器物學上之地位確極重要。其原因有二：一、此種器物發見後，於研究中國古器物學上，與以新的啓示，於理解所謂殷周式、漢式之推移上之困難減少；因而產生「秦式」、「淮式」、「周末式」之說法。二、自二十世紀以來，外人曾唱中國周代銅器藝術乃源於司克泰藝術 (Scythic Art) 之說，自此種器物發見後，於此種學說可與以無情之打擊；又所謂司克泰西伯利亞藝術 (Scytho-Siberian Art) 與中國文物之關係，稍得窺其涯略，正確之解答稍露端倪。

李峪出土之器物，於中國古器物學上，及文化史上之地位，雖極重要，而吾人所得目睹者，向不過其一部份已流往國外者之少數圖影而已。中國人於此向少注意。學者間即偶有引論亦論而不詳，且不無微疵。

渾源有銅器群之發見已久震人耳鼓。今* 春聞馬叔平先生藏有此銅器群之照片，不勝驚喜，既得寓目，更有所出意外，即此銅器群實與所謂「秦器」者同為李峪出土物之一部份，而向不為世人所知者。近日盛傳此銅器群尚秘存北平東交民巷某處。平市報紙亦連載將收歸國有之消息。果爾吾人能得親見實物，則於中

¹ 見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第六期所載之 "The Exhibition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

* 本文初稿作於民國二十四年 (1935)，二十七年修訂定稿，此處的「今春」仍指二十四年。

國古代良工手跡之認識，勝徒弄影片不知若干倍矣。所可憾者，吾人今日於李峪遺物不論在國內或國外者，即其圖影亦不得盡睹。今僅以管窺所及，略加考察，披露於此，俾供治斯學者之摺撫，固未可以研究目之也。

二、遺物及其出土之時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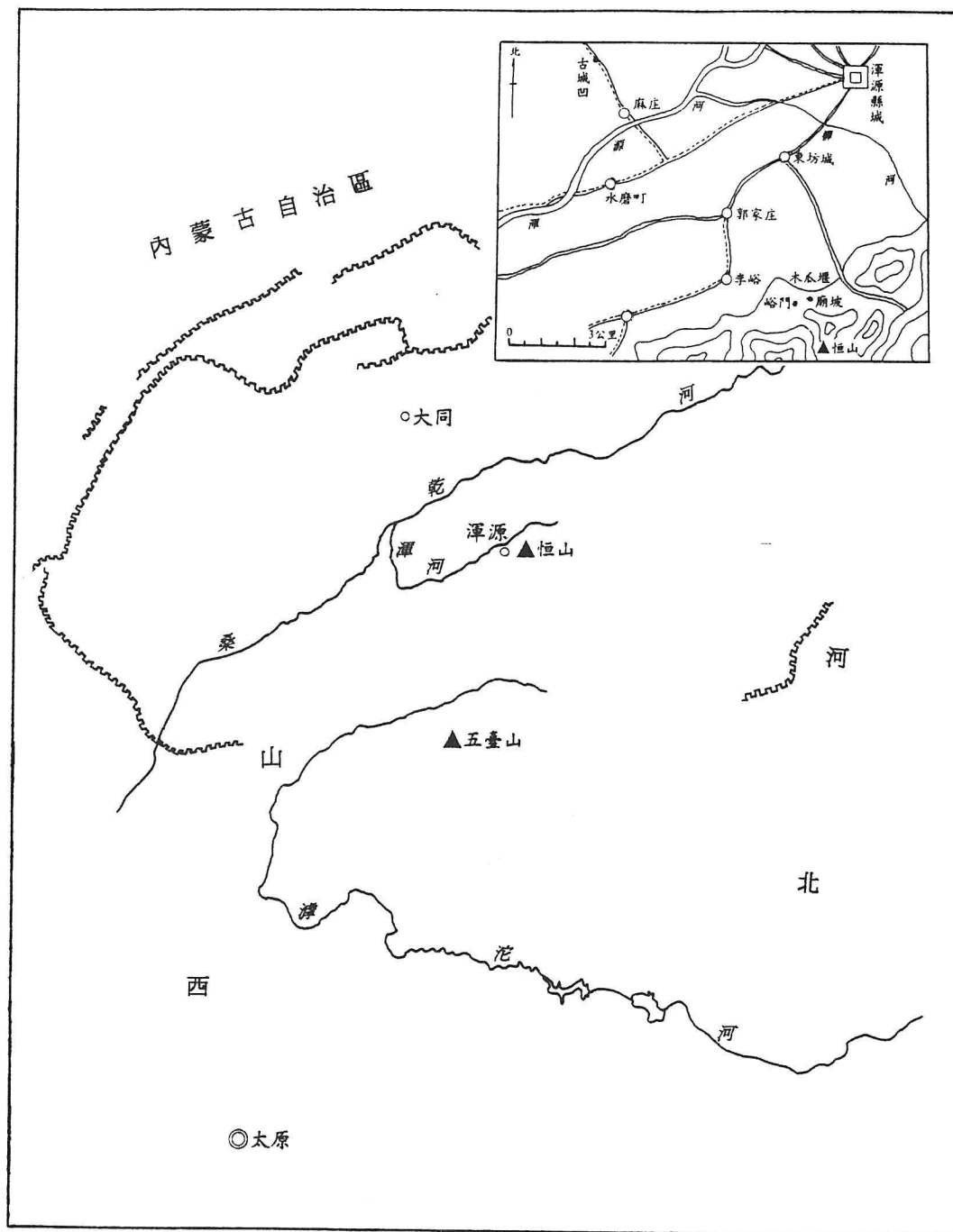
甲、李峪之所在

古代遺物出土之地點，於考古學上之關係極大固不待言。然歷來中國古物之出土，非由於姦人之盜掘，即由於偶然之發見，多非經學術上之發掘者。此種遺物出土情形與在地下之層位皆不明瞭，實失考古學研究上最大之關鍵。故自宋以來，學者間僅據遺物出土地點在歷史上之沿革，以考訂遺物年代之方法，不為近世科學的考古家所取。實則此種方法在不得已情形下，應用於有史時代之考古，有時亦大有裨益，但終多危險耳。近來國內學術發掘雖日漸興起，而多數遺物之出土，仍不脫以上之情形，故此種方法因仍為學者間所沿襲。過去於李峪遺物時代之考訂，國內學者亦多僅據其出土地點在歷史上之沿革以為說。

先是於民國十二年（1923）法國古董商人王涅克（W. L. Wannieck）搜求中國古代之工藝品於華北各地，適於是年李峪人發見古代遺物群（插圖一），* 為氏所聞，遂購得其一部份攜歸巴黎，於民國十三年陳列於 Cernuschi 博物院公開展覽。王涅克並據當地人之傳說，謂此遺物乃秦始皇二十八年（219 B.C.）巡狩各地，於此祭祀山川所埋藏，因名之為「秦器」。於是「秦器」一名遂譟於世，Li-yü 一地名亦傳聞於各國。歐陸之治中國古器物學者，亦多輕信其說而雷同之，遂產生「秦式」銅器之說。然此所謂「秦器」者之出土地，不知何故在東方，如國人徐中舒先生及郭沫若氏，日人小川琢治、梅原末治皆以為在歸化城地方。余去歲發表〈殷商銅器之探討〉** 時亦信此而未加深察。最近則更有襲梅原之誤，謂其出於山西之歸化城者。又數年前徐先生曾據此出土地，推斷其時代曰：

* 增補渾源縣及李峪村位置示意圖。

** 高去尋，〈殷商銅器之探討〉，《史學論叢》冊一（北平：北京大學歷史系潛社，1933）。



插圖一：渾源縣李峪村位置示意圖

據此所謂秦器之說本無若何根據，而歸化城遺物亦當爲趙器。歸化即趙之雲中也。其地在元前三百年始入中國版圖。《史記·趙世家》載武靈王二十六年（元前三〇〇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武靈王取得此地後即視爲邊疆重鎮，身居其地。《韓非子·喻老篇》云：「主父生傳其邦，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史記·趙世家》載此事較詳，其辭曰：「武靈王自號主父，欲立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據此則歸化銅器即武靈王遺物也。傳說以爲秦始皇祭器，全不可信。《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始皇巡狩所經甚詳，獨無巡行雲中之事。而秦時所開通路亦僅自甘泉至雲陽，蒙恬將三十萬眾居上郡，其地皆遠在雲中之南。是秦人於此似無遺蹟可言。²

徐先生非秦器說，而論爲趙器，於其時代之問題上貢獻極大。唯徐先生於三年前認爲所謂「秦器」者乃趙武靈王遺物之說，最近似已放棄，而仍爲學者間所信賴，是以李峪之所在，今不可不辨。

王涅克本爲古物之轉販者，於李峪遺物並無著述公布於世。彼所謂「秦器」者首先於法人狄柴克 (H. d'Ardenne de Tizac) 之《中國古典藝術》(*L'art Chinois Classique*) 言之較詳，但未聲言李峪之所在。日人濱田耕作於其《東亞文化之黎明》僅云李峪在山西大同附近。瑞典人西崙 (O. Sirén) 於其《中國古代藝術史·史前與先漢卷》(*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The Prehistoric and Pre-Han Periods*) 僅云李峪在山西北部恒山腳下。如此則不待庫波 (A. J. Koop) 之《中國古代青銅器》(*Early Chinese Bronzes*) 云山西渾源縣李峪村，吾人已了然其所在矣。^{*} 考諸《渾源州志》，去今治城西南十餘里，有李峪村，背渾水面翠屏山，去恒山主峰不過二三十里。^{**} 北去大同城約百二十里，實即所謂「秦器」者之出土地也。

² 見徐中舒先生之《厲氏編鐘圖釋》。正勝按，頁5下-6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七，1932。

^{*} de Tizac 之說見其著第九章，尤其是頁273-276；濱田耕作，見其著頁56（汪馥泉中譯）；Sirén 見其著頁65-67；Koop 見其著頁8。

^{**} 《渾源州志》卷二城池「李峪口」云：「在城西南十五里，南通代州，北樓口有李峪村堡。」

乙、所謂「秦器」

王涅克所得之李峪遺物，今由梅原末治之〈論所謂秦銅器〉一文，³ 知以銅器為最多，漆器、玉器、陶器、骨角質弓弭、子安貝等次之。銅器之中以容器為多，其餘則為附屬具、帶鉤、戈、劍、轄、轄、銜、銜板等。此等器物已多由王涅克之手分售於英、法、德、瑞典各收藏家，或博物院。今日管窺所及者僅狄柴克之《中國古典藝術》，庫波之《中國古代青銅器》，西崙之《中國古代藝術史》，梅原末治之《支那古銅精華》，及《遠東古物館雜誌》(*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第六期所載而已。其他著述內即有稱引，約亦不出以上五書之所有。今綜合此五書所載，計見：*

臥獸飾蓋蟠螭紋長鼎（圖一）。

禽獸飾蓋蟠螭紋圓鼎（圖二）。

浮雕禽獸魚鱗飾蟠螭紋有腳殘盤（圖三）。

上一盤之足（圖四）。

陰文動物紋飾附耳蟠螭紋殘盤（圖五）。

蟠螭紋繩紋匝（圖六）。

蟠螭紋繩紋變形桓文鑑（？）之殘片（圖七）。

水禽飾蓋蟠螭紋殷（圖八）。

浮雕獸飾蟠螭紋水禽紋殘壺之二附飾怪獸（圖九）。

變形敦（圖一〇）。

臥獸飾蟠螭紋鼎殘蓋（圖一一，此乃圖二二之鼎蓋）。

獸面飾蟠螭紋菱紋匕（圖一二）。

透雕匕形器（圖一三）。

少盧劍（圖一四）。

獸首飾蓋鑲嵌紋鼎（圖一五）。

提鏈結繩紋卣（壺）（圖一六）。

附蓋雙環耳壺（圖一七）。

附蓋雙環耳三角形足容器（圖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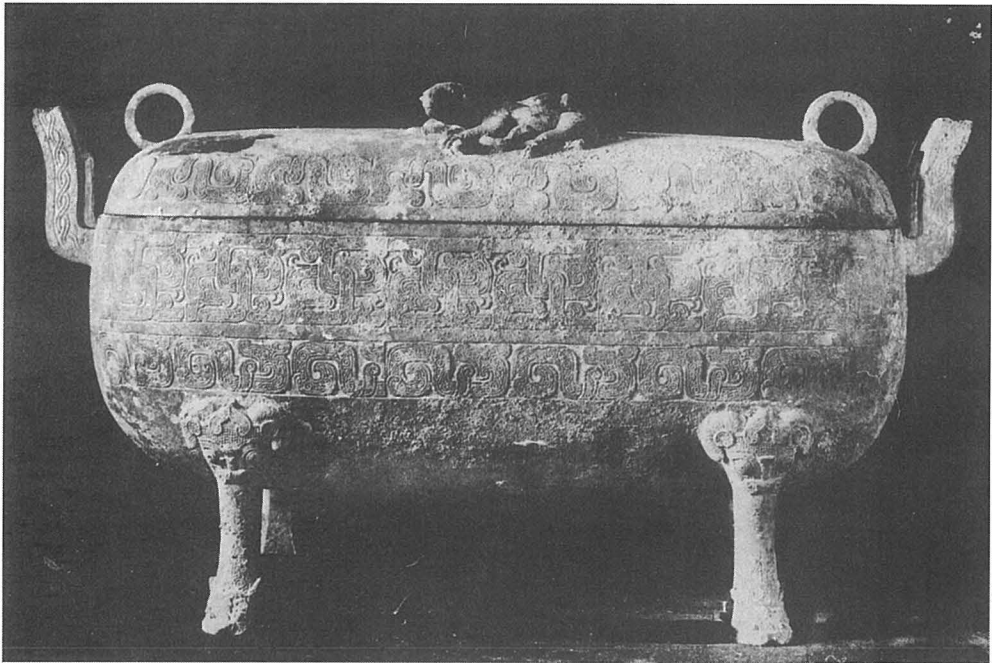
怪獸尊（圖一九）。

³ 見日本三田史學會所出《史學》10.3(1931)。正勝按，梅原末治，〈所謂秦銅器に就いて〉，《史學》10.3(1931)。

* 以下附圖整理者參用其他圖錄，序號重排，後面正文之圖號亦隨之校改。高先生原稿有的只列器名及出處而未附圖，整理時亦加以補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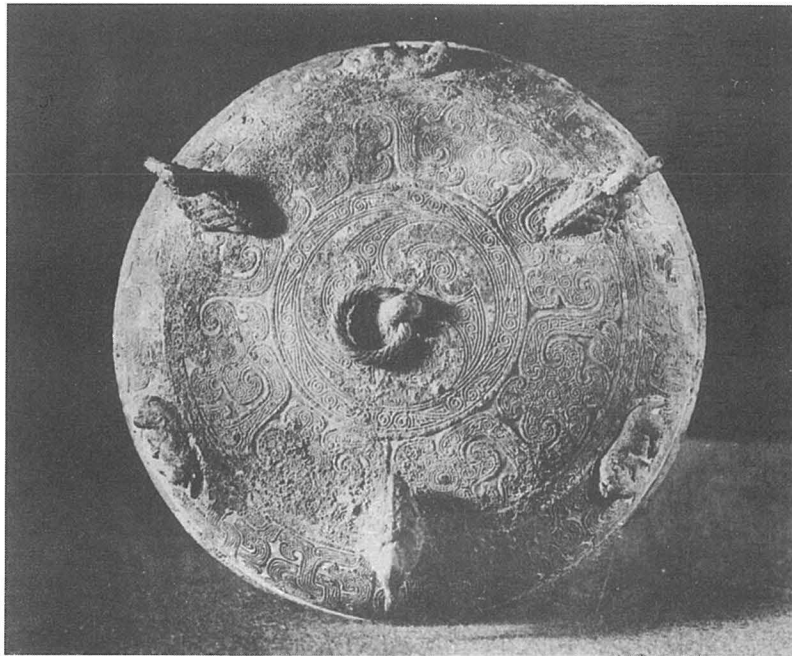
高去尋

此外如王涅克所得之漆器、玉器、骨角器、陶器、子安貝及銅帶鉤、戈頭、銜、銜板等之形式如何，今即其圖影亦不可見。余頗覺此類器物多為當時實用之物，於研究全部李峪遺物之性質、時代及文化上之色彩，較上列諸銅器或尤為重要，而今不得稍窺其一二，誠為憾事。然上列之諸銅器雖未盡王涅克之所得，而於外人所謂「秦器」者之形制文飾，亦可窺其梗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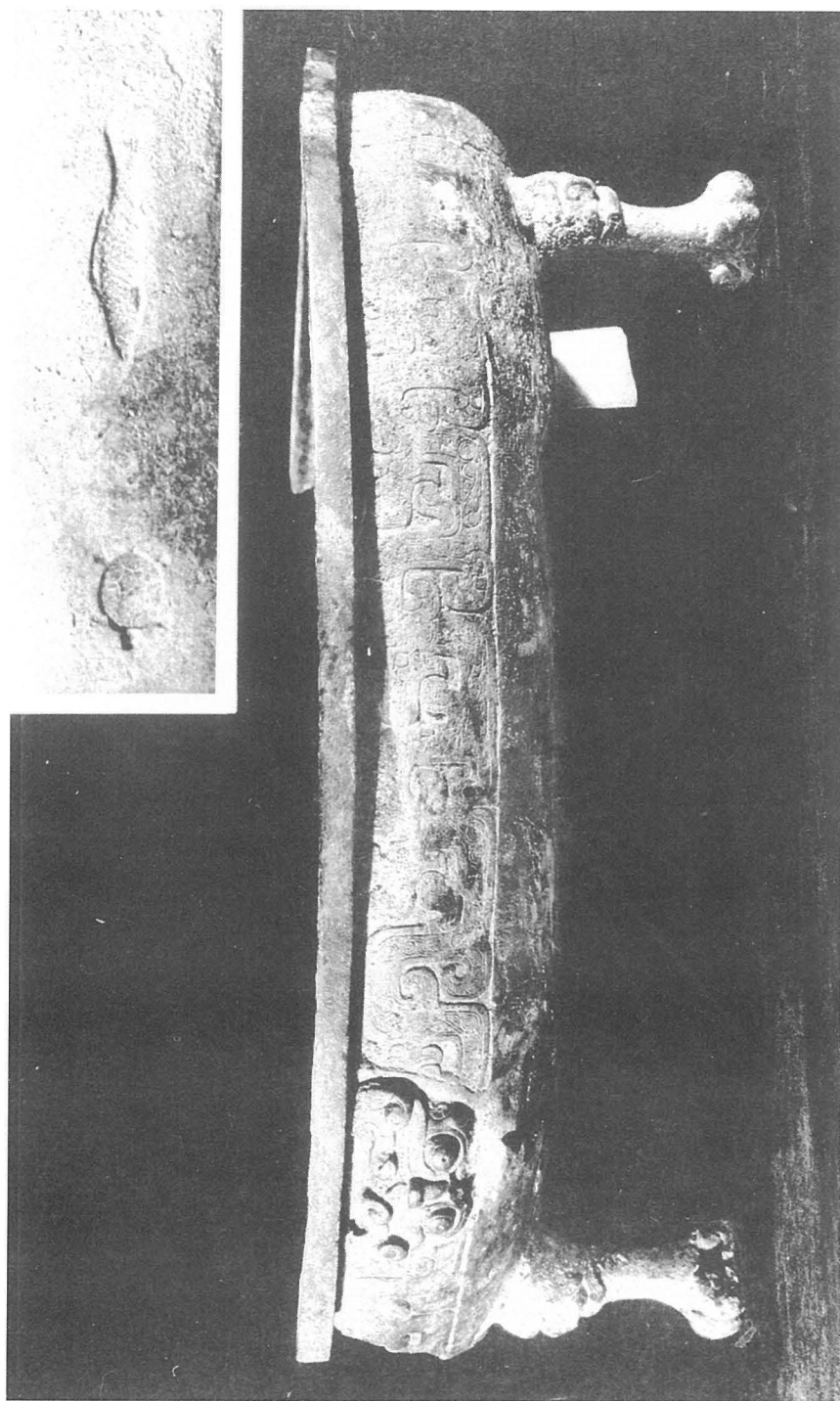


圖一：臥獸飾蓋蟠螭紋長鼎

（梅原末治，1933，圖版1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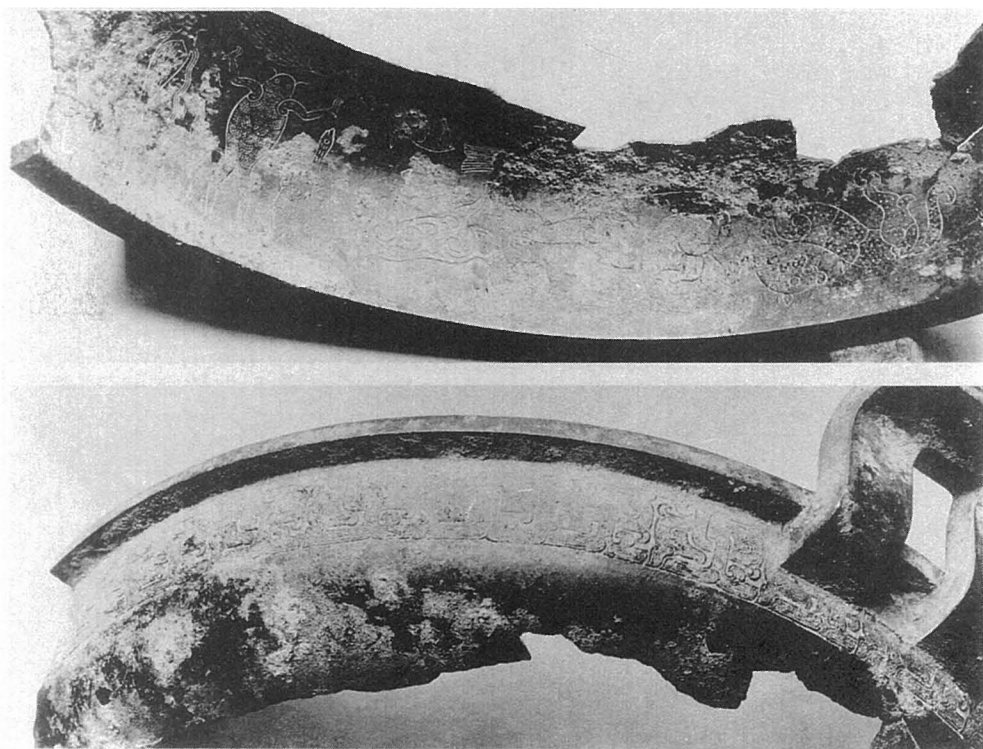


圖二：禽獸飾蓋蟠螭紋圓鼎
(梅原末治，1933，圖版164)



圖三：浮雕禽獸魚鱗飾蟠螭紋有腳殘盤
(梅原末治，1933，圖版 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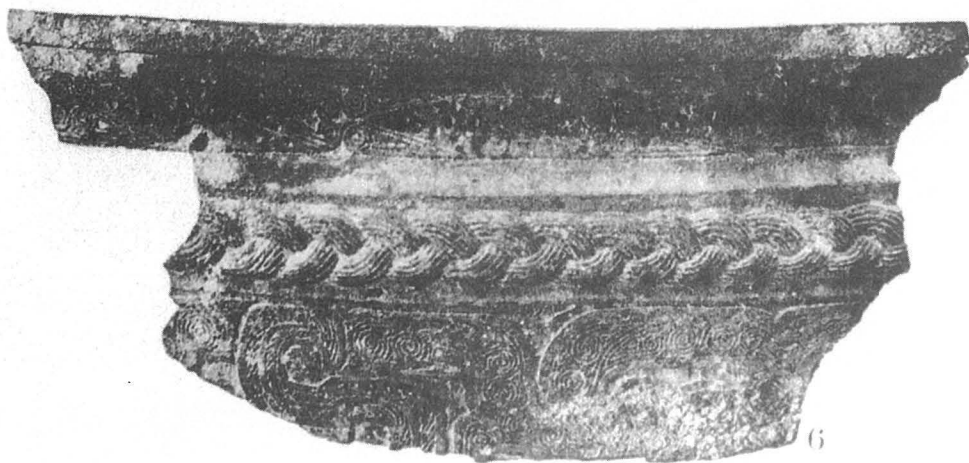
圖四：上一盤之足 ▶
(*BFEA*, No.6, 1934, plate 35:4)



▲ 圖五：陰文動物紋飾附耳蟠螭紋殘盤
(梅原末治，1936，圖版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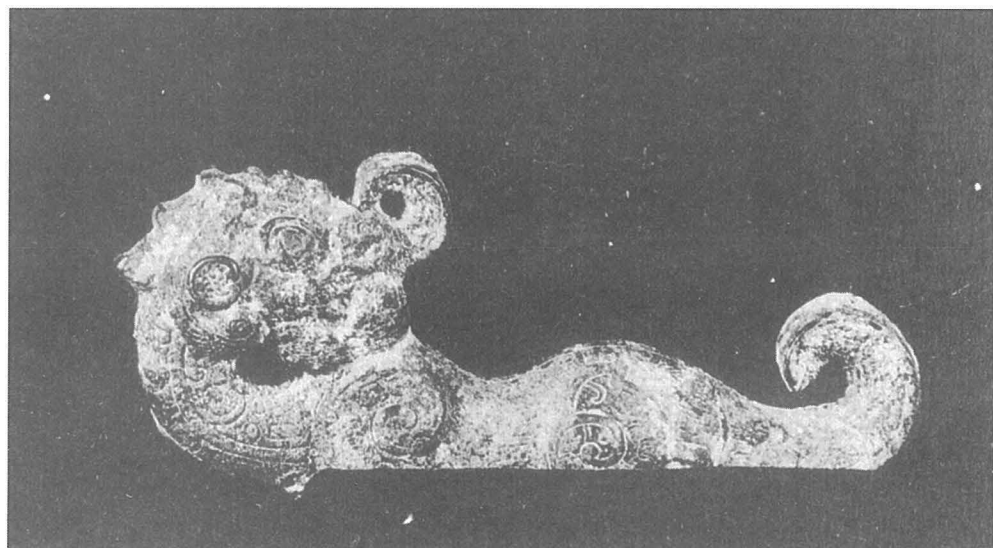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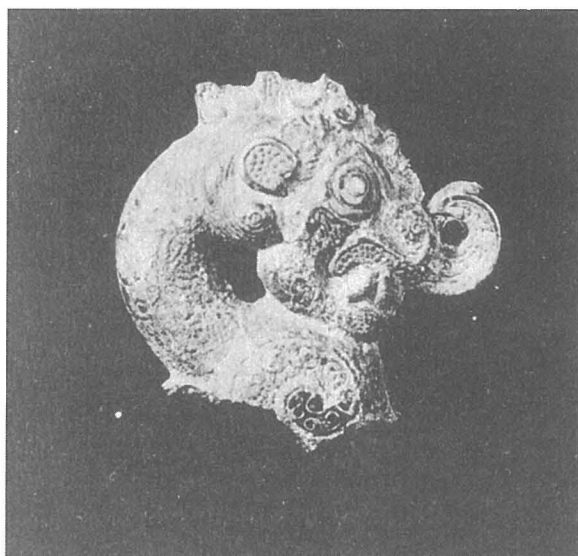
圖六：蟠螭紋繩紋匝（H. d'Ardenne de Tizac, 1926, plate 51）



圖七：蟠螭紋繩紋變形栴文鑑（？）之殘片（*BFEA*, No.6, 1934, plate 3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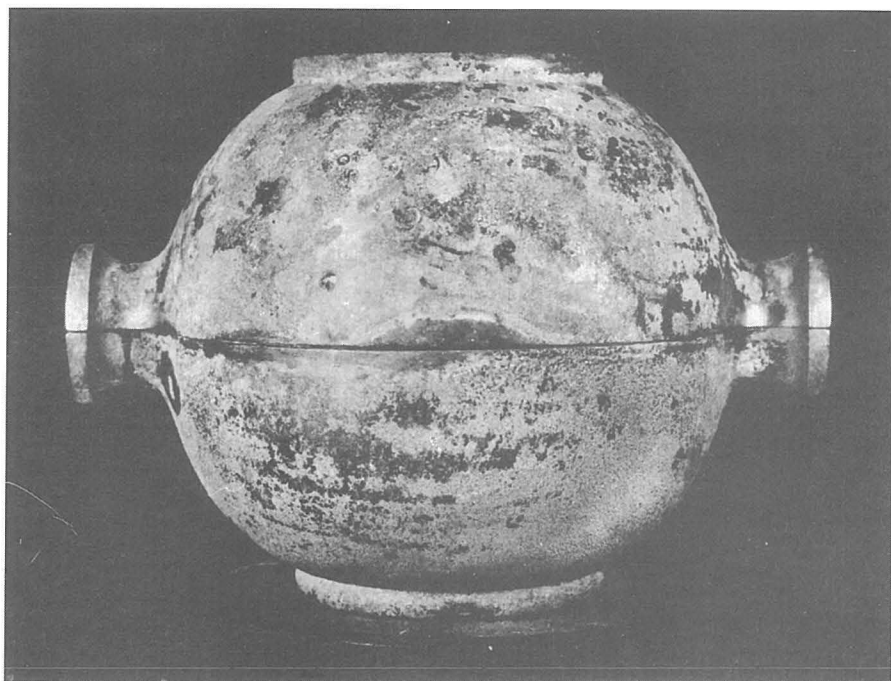


圖八：水禽飾蓋蟠螭紋設
(梅原末治，1933，圖版165)



圖九：浮雕獸飾蟠螭紋水禽紋殘壺之二附飾怪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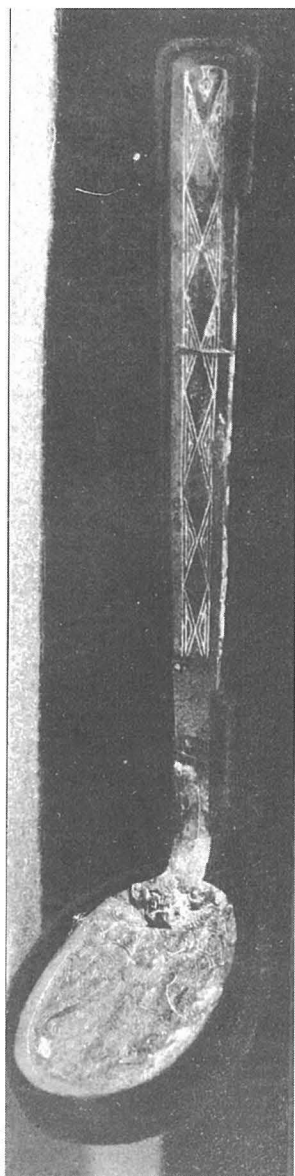
(Osvald Sirén, 1928, plate 96)



圖一〇：變形敦（梅原末治，1933，圖版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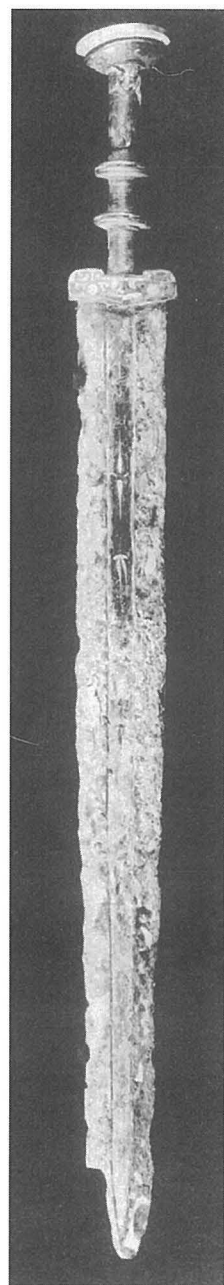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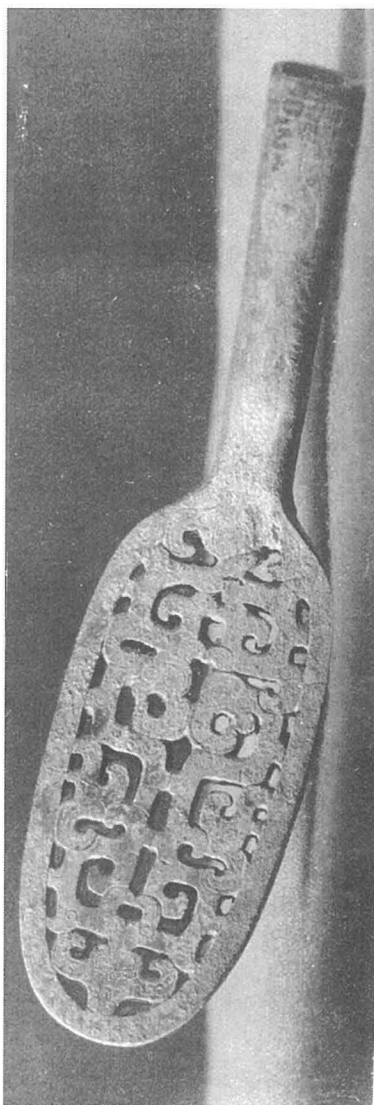


圖一一：臥獸飾蟠螭紋鼎殘蓋（此乃圖二二之鼎蓋）
（梅原末治，1936，圖版23下）



圖一三：透雕匕形器 ▶
(H. d'Ardenne de Tizac, 1926, plate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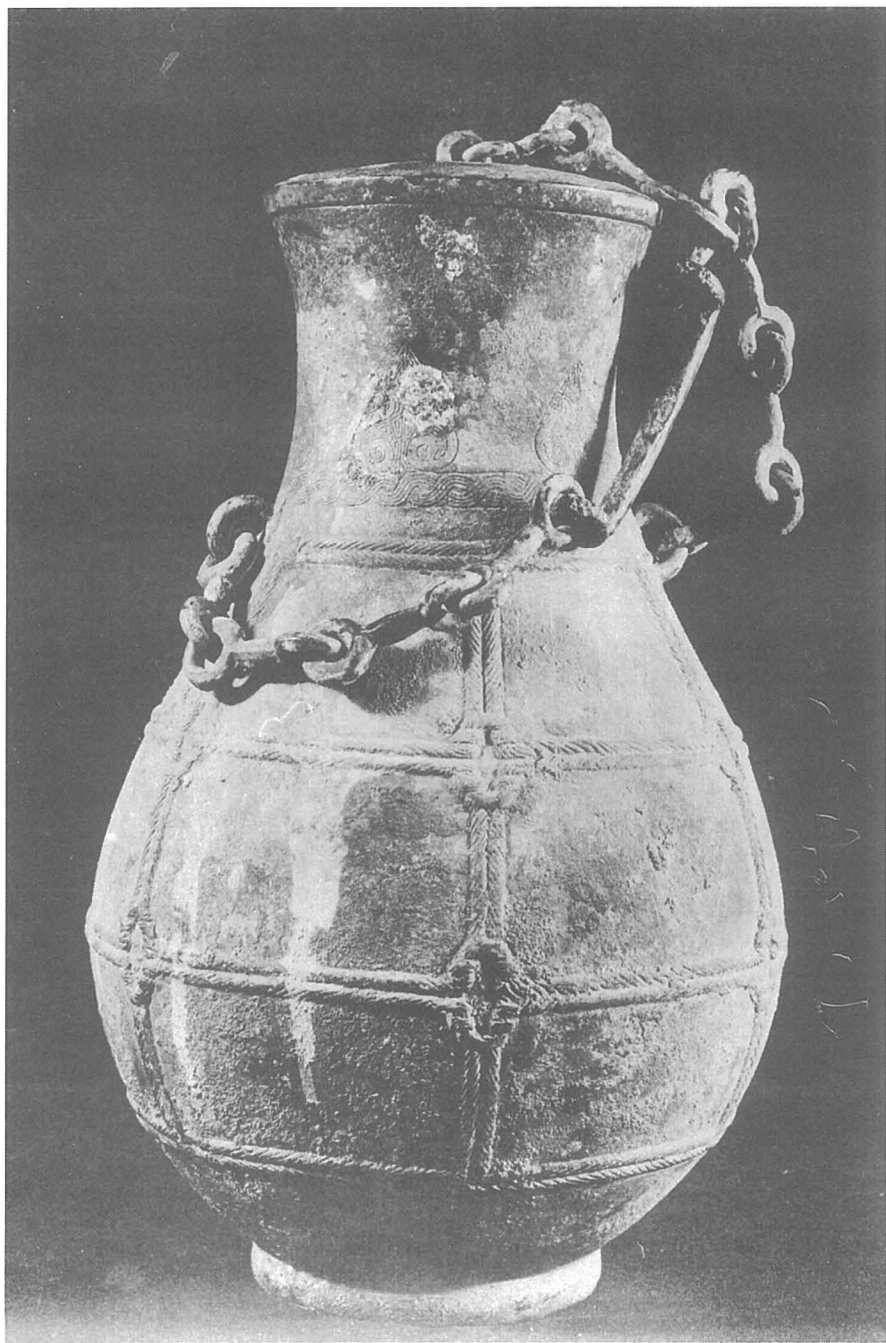
◀ 圖一二：獸面飾蟠螭紋菱紋匕
(H. d'Ardenne de Tizac, 1926, plate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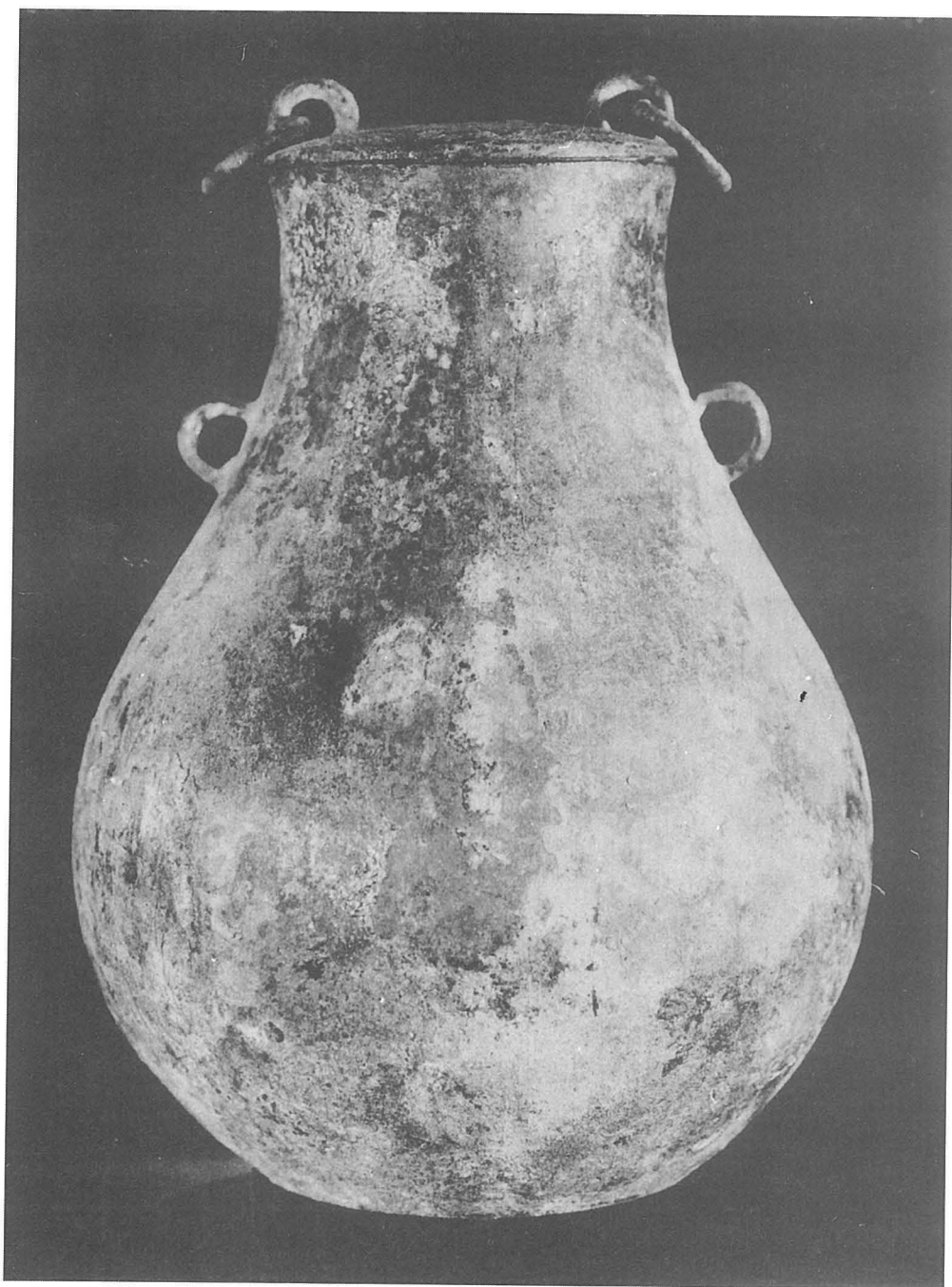
▲ 圖一四：少盧劍
(梅原末治，1936，圖版25)



圖一五：獸首飾蓋鑲嵌紋鼎
(梅原末治，1933，圖版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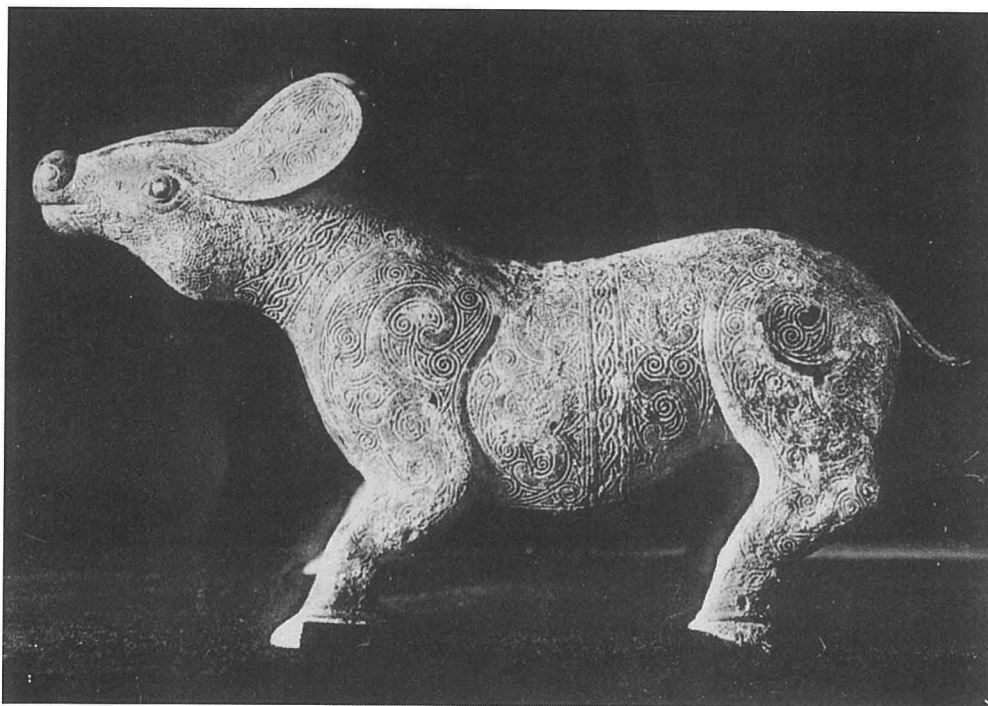
圖一六：提鏈結繩紋卣（壺）
（梅原末治，1933，圖版169）



圖一七：附蓋雙環耳壺
(梅原末治，1933，圖版172)



圖一八：附蓋雙環耳三角形足容器
（梅原末治，1933，圖版171）



圖一九：怪獸尊
(Osvold Sirén, 1928, plate 102)

丙、所謂「渾源器」

數年前國內即有山西渾源縣發見銅器群之傳說。今春既得見馬叔平先生所藏之影片，又探悉去歲渾源人麻席珍君來平，將此種器物圖影發表於北平《晨報》之畫刊，共十八幀如馬先生所藏。麻君於各器物圖影下並附有其高度色澤文飾之說明。雖其於器物及文飾之名稱多可商榷之處，但亦可使吾人於所謂渾源器有較清晰之認識。今據此十八幀圖影計有：

- 獸頭飾嵌珠文鼎（圖二〇）。
- 臥獸飾蓋蟠螭紋款足鼎（圖二一）。
- 失蓋蟠螭紋款足鼎（圖二二）。
- 失蓋蟠螭紋折足鼎（圖二三）。*
- 附蓋環耳素文豆（圖二四a / b）。**
- 附蓋飾虎蟠螭紋豆（圖二五a / b）。⁴
- 獸頭飾蓋素文殷（圖二六a / b）。***
- 穿鼻三孔犧尊（圖二七）。
- 怪獸尊（圖二八）。
- 浮雕獸飾蟠螭紋禽紋壺（圖二九）。†
- 附蓋四耳素文壺（圖三〇a / b）。††
- 嵌石紋結繩紋罍（圖三一）。
- 附蓋雙環耳三角形足容器（圖三二）。
- 變形敦之半器（圖三三）。
- 甗下器（圖三四）。
- 動物紋飾蟠螭紋盤（圖三五）。

* 原稿未附圖，茲據器名補。

** a 是高先生的原照片，鑲嵌紅銅狩獵文，原稱「素文豆」，疑照片不清之誤，當正名為「鑲嵌紅銅狩獵文豆」；b 今存上海博物館，器蓋抓手據云入館以前已修補。

⁴ 此器之圖影後面，馬叔平先生書一殷字，麻君稱之為豆，蓋豆之折足者。正勝按，此器原殘（圖二五a），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上海博物館修補足部（即把手，圖二五b）。

*** 原稿云獸頭飾蓋素文殷，疑為不清楚的圖版所誤，或因未經處理之故，a 是原圖，b 為上海博物館今藏之器範，鳥頭飾，蓋、腹皆有虎紋。

† 原稿作「殘壺」，茲正之。

†† 原稿稱素文壺，可能是照片不清，也可能新出土未經處理。此器可能即今存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的鑲嵌獸文壺，見圖三〇b。

轄（圖三六上）。

轄飾器（圖三六下）。

銜（圖三七）。

然據余所探悉，此銅器群現藏北平東交民巷內某處。其實數並不僅此。或云共二十餘事，或云三十餘事，其詳不得知。如怪獸尊，據麻君云當時出土有四，現存國內者有二，而吾人所見者僅一，或以其形制文飾全相同耳。



圖二〇：獸頭飾嵌珠文鼎
（上海博物館藏）



圖二一：臥獸飾蓋蟠螭紋款足鼎
(上海博物館藏)



圖二二：失蓋蟠螭紋款足鼎
(梅原末治，1936，圖版3.1)



圖二三：失蓋蟠螭紋折足鼎
(梅原末治，1936，圖版4.2)

圖二四a：附蓋環耳素文豆 ▶
（修補前）
（梅原末治，1936，圖版19.4）



◀ 圖二四b：鑲嵌紅銅
狩獵文豆（修補後）
（上海博物館藏）



▲ 圖二五a：附蓋飾虎蟠螭紋豆（梅原末治，1936，圖版9.2）



◀ 圖二五b：修補後
（上海博物館藏）



▲ 圖二六a：獸頭飾蓋素文毬（梅原末治，1936，圖版19.3）



▶ 圖二六b：清理後
（上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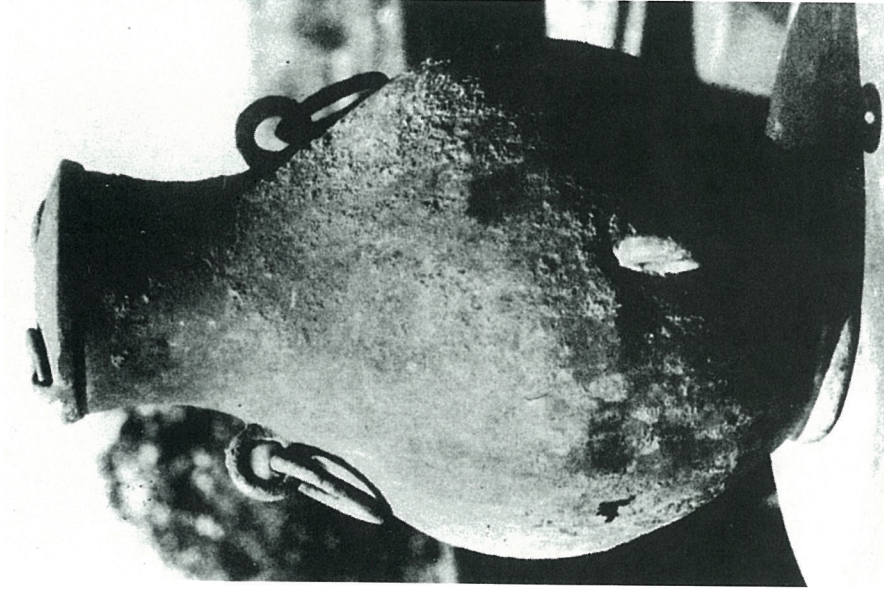
圖二七：穿鼻三孔犧尊
(上海博物館藏)



圖二八：怪獸尊（梅原末治，1936，圖版 20.2）



圖二九：浮雕獸飾蟠螭紋禽紋壺
(上海博物館藏)



圖三〇a：附蓋四耳素文壺
(梅原未治，1936，圖版 19.2)



圖三〇b：清理後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



圖三一：嵌石紋結繩紋壺
(上海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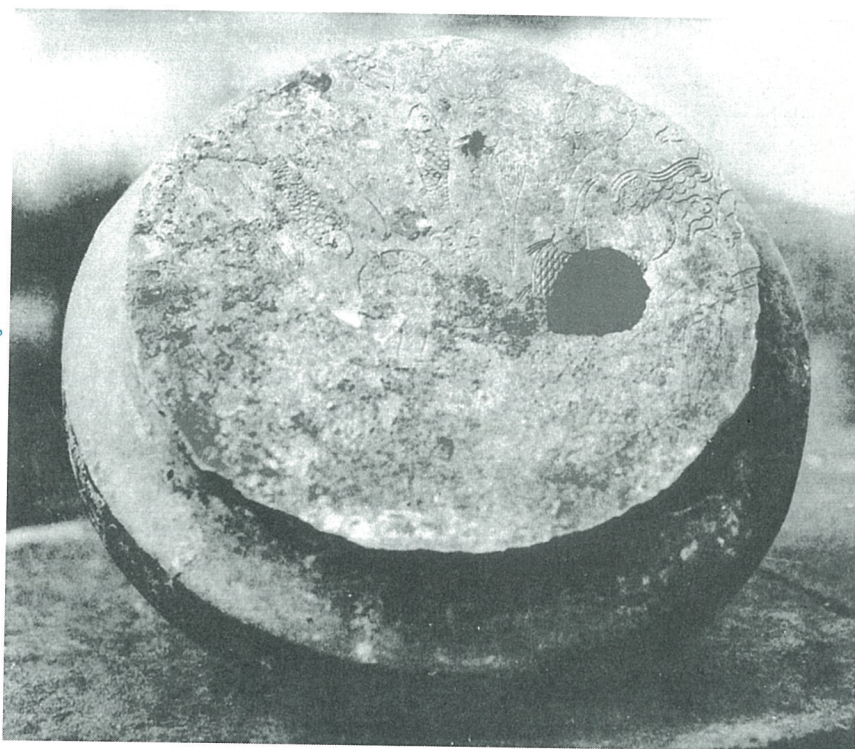
圖三二：附蓋雙環耳三角形足容器
（上海博物館藏）



▲ 圖三三：變形敦之半器（梅原末治，1936，圖版9.1）



▲ 圖三四：甗下器（梅原末治，1936，圖版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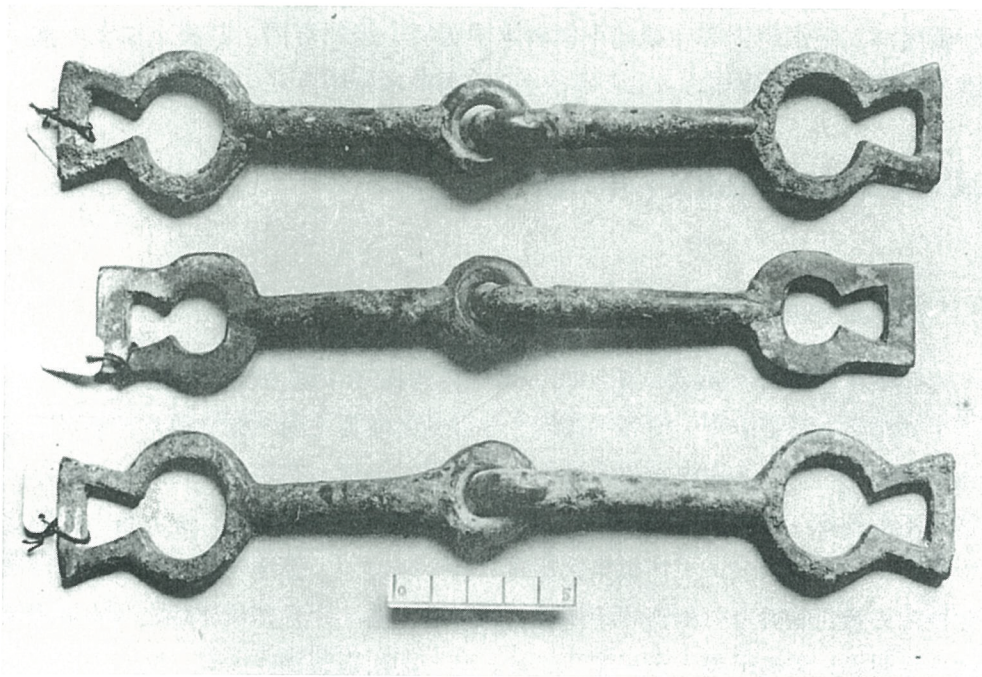
圖三五：動物紋飾蟠螭紋盤（梅原末治，1936，圖版15上、下）



▲ 圖三六上：轄（梅原末治，1936，圖版27.1）



▲ 圖三六下：轄飾器（梅原末治，1936，圖版27.2）



圖三七：銜
(梅原末治，1936，圖版28.2)

丁、「秦器」與「渾源器」之關係

上所列舉之「渾源器」學者間多以為與所謂「秦器」者無關，此或因尚不悉王涅克所得者之真確出土地。麻君於其說明中謂「渾源器」於民國十二年出土於渾源縣之李家村。今考諸各《渾源州志》，並無李家村。此李家村蓋為李峪村之誤，或其俗稱。西崙云王涅克曾言當時李峪村出土銅器本極多，氏所購得者乃其一部份，其餘仍留該地。今則所謂「渾源器」非第與所謂「秦器」者出土之時間、地址盡同，且兩者間更有形制文飾極端相同之器物，如怪獸尊、變形敦、及附蓋環耳三足銅容器等。據此則兩者本同屬於一遺物群內，其為王涅克所攜走者，即誤於世之「秦器」，尚存國內者即盛傳將收歸國有之「渾源器」也。

戊、《貞松堂集古遺文》中二器

1. 「吉日壬午劍」一具

上舉秦器中之一銅劍（圖一四）本見於西崙《中國古代藝術史》第九十六圖。其臘面上錯金成文，但多不清晰。今可見者僅其一面。銘文最末三字可辨出為「之少」。《貞松堂集古遺文》十二卷二十頁，有所謂「吉日壬午劍」一具。不見器形。其銘曰：「吉日壬午。午為元用，玄鏐鑄呂。朕余名之，胃之少」。羅振玉云：「往歲見之都肆，錯金成文。」郭沫若氏於《古代銘刻彙攷續編》謂此劍與上一劍蓋同時所鑄，同時出土者。今春郭氏出版之《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載有所謂「吉日劍」二具。其一即西崙著錄內所載，別一謂乃美京所藏。此藏美京之劍，可得見其兩面。其臘上之金錯銘文，尚隱約可辨，與羅氏所著錄者全同，又字體亦與羅氏所摹寫者維妙維肖，尤以最末一字所殘損處為甚。此劍蓋即羅氏所見於都肆者。今再就兩劍之形制文飾觀察，亦極相同。據此則郭氏謂乃同時所鑄，同時出土者蓋無誤。

又郭氏、羅氏之稱此兩劍曰「吉日劍」或「吉日壬午劍」也，蓋以不識其最末一字故。此兩劍銘文最末一字皆有泐滅處，實則當如形。吾友張政烺先生曰：

此字與《取虛盤》字形近，上從虛，下從出，即虛字。《說文》「虛，虛也，從出，虛聲讀若虛同」，在此與午、呂，為韻。

今按此字釋盧不誤。因在此銘文中非但與午、呂叶韻，且弘尊中臚字作，王子嬰次鑪字作，是此二字所從之盧，皆與此字相近。據此則劍銘末句，乃「朕余名之，謂之少盧」，而劍之名稱亦當呼為「少盧」。

2. 「魚鼎匕」一具

《貞松堂集古遺文》十一卷十頁有所謂「魚鼎匕」一器。柄上端已折去。所存銘文約三十七字。據郭沫若氏所釋，亦當為韻文。⁵ 羅振玉云：「此匕數年前出山西，予初見之都市，僅見金書十餘言，訝為奇物，亟以重金購歸。」又其於《丁戊稿》中跋曰：「此匕數年前出山西渾源州。」有告余者謂此匕亦當為余所謂李峪出土銅器之一，而流入羅氏之手。今察此匕銘文字體與少盧劍者極相近，亦同為金錯之韻文，又其形制與上舉秦器中之「浮雕獸面飾蟠螭紋匕」相同。其作成之時代蓋與李峪遺物同時。又李峪遺物群出土之前，不見渾源有出土品於歷代之著錄，此遺物群出土後，亦未聞於渾源更有所發見，《集古遺文》之編錄在此遺物群出土後已五年，因而余心目中頗覺此匕有屬於此遺物群之可能。然此匕之時代，雖與李峪遺物同，而於其出土之時地僅知「數年前出山西渾源州」一語，如即遽列本題之內，終嫌證據不足。

三、李峪遺物非「秦器」之再辨

李峪既不在綏遠歸化城地方，則過去攻擊「秦器」說之根據，因以全失。然則王涅克、狄柴克等之主張，是否仍可死灰復燃，今當再辨。

甲、秦始皇並未涉足渾源

《史記》〈秦始皇本紀〉及〈封禪書〉於始皇兩次東遊、一次北遊之事蹟，各有載記，似彼並未涉足於渾源。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於是乃並渤海以

⁵ 見郭沫若，《金文叢考》（東京：文求堂書店，1932）中〈韻讀補遺〉。

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僊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爲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堤防。……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僊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秦始皇本紀〉

〈封禪書〉與此略同，今不舉。始皇二十八年出關中，達齊魯之經過，此雖未載；然由二十九年出關經陽武事，可想見其二十八年亦沿黃河東去，未必經渾源也。據此則李峪當地人之傳說不可信。二十九年始皇之歸途，於〈封禪書〉則又曰「過恒山從上黨歸」。恒山即《漢書·地理志》、《爾雅》、《周禮·職方》、《尚書》〈舜典〉〈禹貢〉之恒山，在今河北曲陽縣西北。秦之上黨郡在今山西東南部。余頗疑始皇之逾恒山或即過今之娘子關，未必經渾源再南下入上黨也。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涉足渾源否不可知；即或經渾源亦當無望祭山川之事，否則〈封禪書〉於始皇在各地封禪或求神仙事，皆有載記，不當於此獨無。總之就歷史上之記載，覺非但秦始皇於二十八年未於渾源祭祀山川，即其一生或亦無此舉。

乙、對狄柴克提出之反證

狄柴克於其《中國古典藝術》中曰：

謂其屬於秦始皇者，蓋根據當地人之傳說。中國文籍中雖未嘗提及一字，然經再三考核，吾人亦不能得反面證據。且此等器物皆精心之作，絕非一般普通人所配用。再就另一方面言之，彼等皆具有異於典型的周漢器之特點。*

* 狄柴克之論的原文是："L'attribution à l'Auguste Empereur s'appuie sur une tradition locale; les textes sont muets à ce sujet, mais, à l'examen, rien ne vient l'infirmer. Les objets témoignent d'un travail soigné qui ne les rend pas indignes des mains impériales; ils offrent, d'autre part, des particularités qui les distinguent des pièces Tcheou ou Han classiques." H. d'Ardenne de Tizac, *L'art Chinois Classique* (Paris: Henri Laurens, 1926), p.273.

是狄柴克所以深信當地人之傳說，認為李峪遺物乃秦始皇器者，共出於三項見解。一、如非秦始皇物又無反證。二、非秦始皇不能用如此精美之物。三、此等器物與典型的周漢器有不同之點。其第二項見解，凡於中國古歷史、古器物具相當知識者，皆當覺其不值一辨。其第三項見解，認為此等器物與典型的周漢器有不同之點，吾人亦有同感；但據此而以爲屬於秦始皇者則大謬。此等器物之相當時代，於後有推斷，今不論。其第一種見解，乃李峪遺物是否秦器之根本問題，今當提出二項反證，略述於下。

1. 古代祭祀恒山不在渾源

古代祭祀恒山有在渾源之說，不自今日始。明憲宗時馬文升亦因此上疏請改祀恒山於渾源。其〈疏〉有曰：

《虞書》肇十有二州，蓋每州表山之高大者以爲鎮。而恒山爲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歷秦漢隋唐，俱於山所致祭。五代河北失據。宋承石晉割略之後，以白溝爲界，遂祭恒山於真定府曲陽縣。文之曰地有飛來石，不經甚矣。然宋都汴，而真定爲其北邊，是亦不得已權宜之道也。……夫《周禮》曰恒山在并州鎮，在正北。《一統志》曰，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又渾源廟址猶存，故老傳說的的不虛。（引自《亭林文集》卷一〈北嶽辨〉）

清初顧炎武於此〈疏〉所云，曾與以嚴厲之駁斥，並譏其似未見十七史，僅道聽塗說而已。⁶ 顧氏又據歷代史文，及親至曲陽渾源兩地觀察之所得，爲〈北嶽辨〉一文，以爲自三代迄宋，各帝王之祭恒山當皆在今之曲陽境內。顧氏此文，雖據《虞書》、《周禮》、《爾雅》之注文，以言三代，使人不能無疑；然其說終不可移。其原因有二：一、古代祭祀山嶽，乃源於具宗教性之對山嶽崇拜。所祭祀山嶽之地點，亦頗具歷史性，非可輕易改變者。譬如北魏建都平城，即今之大同，本與渾源相鄰；而《魏書》載明元帝、太武帝、文和帝之祀恒山必南至曲陽者，乃遵古先之命祀不敢變也。漢之祀恒山於曲陽亦當有所本。二、《史記》云：「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邦。」《水經注》謂上曲陽縣故城「本岳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

⁶ 見《亭林文集》卷之一〈北嶽辨〉一文所附錄。

狩常以歲十一月至於北嶽，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昭王南征不還，巡狩禮廢。邑郭仍存。秦罷井田，因以立縣。城在山曲之陽，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爲上矣。」據此則祀恒山在今曲陽境內，於漢本由來已舊。秦始皇祭祀恒山事本文獻無足徵者，即或有之，據此可知當亦不在渾源。

2. 李峪遺物非祭祀山嶽所用

中國古代封禪山川之禮，雖如太史公所云：「損益世殊，不可勝記；」然要亦不過修封與祭而已；或自秦始皇時始有石檢印封之事。故《後漢書·祭祀志》論之曰：

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爲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爲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

又《史記·封禪書》於始皇禪梁父曰：「其禮頗采大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此云封藏者，疑即石檢印封之事。其禮頗采祀雍上帝所用者，蓋或以特尊東嶽，或以天子親祭而有所增益。然《封禪書》載始皇之先世之祀雍上帝者，皆用牲而已。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之天地名山大川鬼神，祀以牲，其圭幣各異，而近天子都者，始有加益；唯以雍四時上帝爲最尊。然祀雍上帝亦不過用木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圭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恒山乃嶠以東五名山之一，其祀當用牛犢各一牢，具圭幣而已。是以李峪遺物絕非祭祀恒山所用。即如始皇親往致祭，所用容或有加益，想亦不過如禪梁父時，采祀雍上帝之禮。再退一步言之，如即更多加益，亦於遺物中何以有戈、劍、弓弭、帶鉤等，仍不得其解也。

總之吾人就古代文獻上之考察，秦始皇並未涉足渾源。即如有祭祀恒山之事，亦當在今之曲陽境內。李峪遺物之性質，亦非祭祀山川所用之祭器。據此則「秦器」之說，本毫無根據；「秦式」一辭，亦當與以更正。

四、遺物出於墓葬說

當時李峪出土之遺物，爲王涅克所攜走者據云大小約五十餘事，今日仍存國內者亦約二三十事，此外當尚有少許流落於國內外，如此則此次所發見之豐富，未必稍遜於同年新鄭之出土物。外人認爲乃秦始皇祭祀山川所用，毫無理由之可言。實則此等遺物乃出於古代之墓葬。

古代厚葬之風本極盛。死者生前之所服御玩好，多用以殉，其子孫或更益以祭器明器之屬。見諸實例則有新鄭春秋末葉墓、洛陽壽縣戰國墓之發見，及濬縣周代墓、樂浪漢時冢之發掘。考諸載籍，西周及其以前不詳。東周之後，厚葬之風亦盛。《西京雜記》中之所謂晉靈公冢，《述異記》中之所謂闔閭夫人冢，雖未可盡信，然由《史記》所記之吳王闔閭冢，亦足見此時貴族墓內規模之大，貯藏之富。戰國之世，此風益熾。秦惠文王、武王、昭襄王、魏襄王、哀王之墓，皆多所埋藏。當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夫玩好貨寶，鍾鼎壺盃，輦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 故《墨子》、《呂氏春秋》皆有節喪葬之論。至若驪山之陵，一讀《史記》、《漢書》、《水經注》之文，不禁瞠目咋舌，知所以祖龍一喪而社稷隨墟矣。

李峪遺物之發見，據西崙云於窟狀之坑穴內，⁷ 濱田耕作云於李峪丘陵端之城壁內部。⁸ 此種情形當係墓葬上部塌陷，或劈裂所致。至於各遺物之性質更無一非古代墓葬內所當有者。

銅帶鉤

形制不詳。遺物群出土時有人骨之發見否雖不得知，然有此物之出見，可確斷其出於墓葬。當時蓋有人骨伴出，或人骨已全腐朽。因帶鉤乃施於衣帶者，其之出見亦當在人骨架上或其附近。

* 引自《呂氏春秋·孟冬紀·節喪》。壺盃，畢沅引梁仲子云，劉本作「壺鑑」。

⁷ 見西崙 (Oswald Sirén) 之 *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the Prehistoric and Pre-Han Periods* (London: Ernest Benn Limited, 1928).

⁸ 見濱田耕作之《東亞文化之黎明》。正勝按，見汪馥泉中譯本（上海：黎明書局，1931），頁56。

銅戈劍

戈之形制不詳，因而爲明器或生前之用器不得知。劍之銘文已自示爲生前所造，死以爲殉者。

骨角質弓弭

弓弭之發見，知有弓之殉葬。但弓之木質「弣」「淵」，革質「絃」，或早已朽腐不爲人所見耳。弓與戈劍皆爲兵器，除墓葬外不當爲祭祀山嶽所有。

銅「轄」、「轄飾」、「銜」、「銜板」

「轄」、「轄飾」乃車上所施。「銜」、「銜板」乃馬具。古代車馬殉葬之風甚盛。據聞中央研究院於濬縣發掘衛人墓葬，有殉葬車馬之發見，於安陽發掘殷人陵墓，亦有相同之發見。^{*} 春秋之世，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⁹ 邾子卒，則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¹⁰ 是亦以車馬爲殉也。洛陽發見之韓君墓，據聞或附有馬坑，或墓內殉有車飾具馬具，是此風於戰國之世猶未稍衰也。而此遺物群內僅有一二車馬上所施之零件，可知當時墓葬之旁未必附車馬坑，墓葬之內或亦無整車匹馬。然此殉一二車器馬具者，乃代車馬藏乎壙之意者也。緣一器而群工致巧者車最多，況「降及戰國，奢僭益熾。……競修奇麗之服，飾以輿馬，文麗玉纓，象鑣金鉸，以相夸上。」^{**} 當時車馬本極貴重，蓋不忍以整車匹馬置諸壙中。

子安貝

此遺物群內之有「子安貝」亦乃其出於墓葬之一佳證。例如新鄭洛陽及甘肅鎮番沙井村之墓即有諸多子安貝出現。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蓋埋錢於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自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在濬縣辛村進行發掘，至二十二年十二月，前後四次，發現車馬。高先生所謂殷人陵墓蓋指民國二十四年春季侯家莊西北岡第二次發掘M1004所得的銅車飾，因爲初稿寫於這年。

⁹ 見《左傳》成公二年。

¹⁰ 見《左傳》定公三年。

^{**} 引自《後漢書》志第二十九〈輿服上〉，點校本頁3640。

壙中，爲死之用，至唐王嶼乃於喪祭焚錢以代之。¹¹ 是近世喪葬之焚紙錢，乃源於漢之瘞錢。漢之瘞錢，蓋源於古代墓內之埋貝。考貝之用，最初或爲裝飾之物，殷末時又用爲貨幣，而於此遺物群之時代是否仍有其貨幣上之價值，誠大有問題。然埋貝於壙之風，想由來已舊，故此時仍爲一般人之所沿習。例如吾人今日已通行銀幣或紙鈔，而一般喪葬仍焚紙錢楮鏹，正足示喪葬之禮因具宗教意味頗富保守性也。

此外遺物群內之諸多銅容器亦即如《呂氏春秋》所謂殉以鐘鼎壺鑑之類。漆器、陶器，想或爲生前所用，或爲明器。至若其「怪獸尊」余初疑或即如《穆天子傳》中黃金之鹿，及驪山陵中金銀鸞鳥之流，或乃生前之所玩好，死以爲殉者，即狄柴克云：「此獸背上初必有一容器，用以盛犧牲之血，但今已失去，」¹² 亦未破余之所疑。近見麻席珍之說明始知其「背上有缺損處，詢悉原有二雙，背上各有瓠觚一，二貯綠水，二貯綠粉，出土時鬆軟如泥，俱毀棄。」麻君所謂瓠觚者雖不知若何形制，但據此則此等怪獸尊亦可視爲容器之一種。其貯綠水者蓋或所貯者爲酒，其用與所謂犧尊、象尊、鸛尊等之用器身內酒同。其貯綠粉者，蓋盛稷黍之屬，因日久而朽化使然。

五、遺物屬於趙武靈王說之商榷

余既主張李峪遺物乃出於古代之墓葬，當更進一言於其屬於趙武靈王之遺物說有所商榷。^{*}

《史記·趙世家·集解》 應劭曰：武靈王葬代郡靈丘縣。

《史記·趙世家·正義》 《括地志》云：趙武靈王墓，在蔚州靈丘縣東三十里。應說是也。

¹¹ 見《舊唐書》〈王嶼傳〉。

¹² 見狄柴克之《中國古典藝術》。正勝按，此語查不到出處，「怪獸尊」見圖二八，狄柴克推測此獸背上有一容器，參證山彪鎮第一號墓出土的犧尊，背上有一盤（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但是否盛犧牲之血則不可考。

^{*} 李峪遺物屬於趙武靈王說，當指徐中舒，見所著《厲氏編鐘考釋》，發表於民國二十一年（1932）。後來日本學者森鹿三（指點梅原末治歐洲學者所說的 Li-yü 即李峪）於昭和十年（1936）十月《東洋史研究》創刊號也發表〈晉·趙の北方進展と山川の祭祀〉一文，認爲李峪銅器群從出土之地域、遺物之性質與時代性觀之，應是趙氏祭祀山川的遺物，但高先生此文之作早於森氏文章的出版，應該不是指他。

《漢書·地理志·代郡靈丘注》 應劭曰：武靈王葬此，因氏焉。

《元和郡縣志》 趙武靈王墓在靈邱縣東三十里。

據此則趙武靈王墓當在今之靈邱縣境內，靈邱一縣名，亦因有此墓而起。而臣瓚、酈道元、顏師古等，於此則提出異說：

《漢書·地理志·代郡靈丘注》 臣瓚曰：靈丘之號，在趙武靈王之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水經注·滹水篇》 瓚注《地理志》曰：靈丘之號在武靈王之前矣。又按司馬遷《史記》趙敬侯九年，敗齊于靈丘，則名不因武靈王事如瓚《注》。

實則此種異說不可信。清初顧炎武於《水經注大梁靈丘之誤》辨之曰：

按《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十五年，趙與韓魏燕共擊齊，湣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淄。而孟子謂臧宣孟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此別一靈丘，必在齊境，後入於趙。而孝成王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益明其不在代郡矣。《水經注》云，是誤以趙之靈丘為齊之靈丘，而不知齊境不得至代也。¹³

清順治十七年，宋起鳳所纂修之《靈邱縣志》亦非《水經注》之文，認為靈邱之名，乃源於境內之有武靈王墓。據此則應劭所云，《括地志》、《元和志》所載皆有其根據。又考今靈邱縣城，乃唐貞觀五年所移置。其故城據：

《括地志》 靈邱故城，在今縣東十里。（嘉慶《重修一統志》引）

《太平寰宇記》 靈邱故城在縣東十里。又二十里為武靈王臺，土阜尚存。

靈邱故城既在今城東十里，則應劭所云，《括地志》、《元和志》所載武靈王墓之地點皆相同。而《寰宇記》所謂武靈王臺，蓋即其墓塚。古者墓葬，或因山，或墓塚高大，後世之人往往稱之為丘，如楚昭王墓之稱昭丘，¹⁴ 吳闔閭墓之稱虎丘。¹⁵ 武靈王墓前人皆稱之為靈丘，故縣氏之，至宋人始誤以其墓塚為臺矣。

¹³ 見《日知錄》卷三一。

¹⁴ 見《水經注》卷三二「汧水」條。

¹⁵ 見《吳越春秋》。正勝按，原注誤，應更正為《越絕書》卷二《越絕外傳記吳地傳》。

趙武靈王墓既在今靈邱縣城東三十里，去渾源縣李峪村約百四五十里，李峪遺物決非趙武靈王所有。然李峪遺物究竟出於何人之墓內，則文獻無徵者也。

六、銅器形制文飾之特徵

李峪遺物既非秦始皇之物，又非趙武靈王之物，是過去其年代上之建設，已根本動搖。然則其當屬於何時之遺存？吾人知遺物中之戈劍皆具銘文，然戈之形影銘文皆不得見，王涅克之札記，謂其上作秦之銘文，梅原末治又已證其不確，¹⁶劍之銘文又不足考訂其絕對之時代，如就其書法而論，亦僅為求其大體的時代之助耳，故欲解決此問題除就遺物本身之研究外別無他途。然李峪遺物，今為吾人所得見者不過其大部銅器之圖影，故亦祇能於此類器物形制文飾之特徵，略加敘述。

甲、形制

1. 鼎

鼎之形制約可分為四種。

a. 四足長鼎（圖一）。歷代著錄內之長方四足鼎，其時代無晚於西周中葉者，《西清古鑑》中之晉姜方鼎，器或真實，銘文乃偽刻。此種長方鼎多為長方胴，唇耳，柱式足，或鳥獸形足，與此鼎之形制有別。此鼎器胴及蓋皆為圓角，器作錯牙式唇，附兩長方耳，四足微屈，蓋上有兩臥式獸兩環形紐。

b. 方耳圓鼎。此式鼎有二：一（圖二）則器胴作半圓球體，加蓋成橢圓球形，胴外有紉式圓周稜，錯牙式唇，三足皆稍彎屈，作獸腳式，與胴相接處具獸面飾，蓋上有三水禽三獸相間伏臥，蓋中心有紐穿以紉形環。一則蓋已失，器胴作半圓球體，錯牙式唇，長方附耳，外有紉形圓周稜，三足已折去。

¹⁶ 見梅原之〈論所謂秦銅器〉或〈在歐洲的支那考古學上的資料與其研究〉，載《佛教美術》第十五冊。正勝按，前者載於《史學》10.3(1931)，後者收入梅原末治，《支那考古學論攷》（東京：弘文堂書房，1944）。

c. 環耳圓鼎。此式鼎有二：一（圖二〇）則胴作半圓球體，外附兩環狀耳，錯牙式唇，三細長之獸腳式足，蓋之上凸作層台狀，上有三獸首，一已折去，中有環紐。一則胴作深半圓球體，口部稍向內折斂，胴外附兩環形耳，蓋微向上凸已殘破，飾獸首一，三足亦作獸腳式，極細長。

d. 鬲足式鼎。此式鼎有二：一（圖二一）器形如鬲，三款足，愈下端愈細，而唇作錯牙式，胴外有圓周棱，兩長方耳，附蓋，蓋上有三臥獸，中有一紐穿環。一（圖二二）器之形制如前，惟三款式足之下端作獸蹄式，圓周棱作紉形，蓋已失，疑瑞典皇太子所得之鼎蓋殘片（圖一一），¹⁷ 即此器之蓋，因兩者文飾同具一種特彩也。

2. 豆

較古之豆多為淺杯式胴，粗大之高圈足，今此遺物群中之二豆皆為細柄豆式。一（圖二四）則胴近半圓球體，外附兩環耳，柄細中空，下端外張近附「鐙」式，蓋上有短柄，上端幾成圓平面狀，可卻置。一（圖二五）柄已折去，器胴亦近半圓球體，外附四虎狀獸，蓋之形制亦如前一器者。此豆之形制文飾除缺柄外，其餘皆與紐約大都會（Metropolitan）博物院所藏之豆極相同，¹⁸ 疑後者亦李峪之出土物。

3. 甗下器（圖三四）

較古之甗大都乃上下兩器不可分離，在上下格之間置箄。李峪遺物中之甗，則上下分離為二，其上似甗之器已失，下器如鬲而廣肩，口高出以內於甗底，肩上有兩浮雕獸面，獸鼻各穿環一。無文飾。

4. 匱（圖六）

吾人所常見之匱大都有四足或三足，有蓋，間或有無足者。此匱淺腹，流作獸頭狀，其蓋作環形如他器之具環耳，底下有短圈足。

¹⁷ 見《遠東古物館雜誌》第六期 "The Exhibition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正勝按，pl. XXXV:5。

¹⁸ 見西崑《中國古代藝術史》第一冊，圖版一〇四。正勝按，《史前與先漢卷》。

5. 盤

盤之形制有三式：一（圖三五）淺胴平底，侈口無耳足。一（圖五）淺胴平底，侈口，胴外附有兩長方耳，無足。一（圖三）已殘破，淺胴，侈口，無耳，胴外有浮雕獸面，下端已折斷，疑作穿鼻形者，下當有四足，今僅見其二，足上端與胴接處作肉雕獸面飾，下端作獸趾形，瑞典皇太子所得之器足（圖四），¹⁹蓋即此盤之所有。

6. 罍（圖三一）

短頸，侈口，碩腹，平底，無圈足及耳。此種形制與《周金文存》卷五頁二十五所載春秋初年之罍相近。

7. 卣（圖一六）

歷代著錄內所稱之卣，實為一種附提梁之壺，其梁多為細彎板狀或紉狀。李峪遺物中之提鏈結繩紋卣，亦乃壺之附提鏈者，今仍稱之為卣者，乃使讀者易了解其形制。器作壺形，肩之上兩環耳穿鏈之兩端，蓋上有環紐穿鏈，此鏈亦與提鏈相穿結。

8. 壺

共見三器。一（圖二九）則長頸，碩腹，侈口，圈足，頸上兩旁有附飾件之殘斷遺痕二塊，疑西崙《中國古代藝術史——史前與先漢卷》圖九十六之B、C（即本文之圖九）乃此器上所附飾者。壺頸上附飾立體式虎，亦見於新鄭之方壺、²⁰壽縣出土之曾姬無卣壺。²¹一（圖三〇）則長頸，碩腹，短圈足，肩上有兩環耳穿環，腹下部又有兩環耳，蓋上有兩環形紐各穿一環。一則見於《支那古銅精華》中，則長頸，碩腹，小平底，肩上有兩環耳各穿一環，蓋形如前一器。無文飾。

¹⁹ 見《遼東古物館雜誌》第六期之 "The Exhibition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正勝按，pl. XXXV:4。

²⁰ 見關百益輯、何日章校，《新鄭古器圖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第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圖。

²¹ 見劉體智藏、鮑鼎編，《善齋吉金錄》卷三（廬江劉氏影印本，1934）。

9. 犧尊（圖二七）

此器像牛形，兩角向下彎，穿鼻綴環，目睛作凹孔狀，疑有鑲嵌之物已脫落，尾已折去，項背及跨骨上各有圓口伸出，背上之口更有兩環耳，一穿環，疑此三圓口之上皆當有蓋。

10. 怪獸尊

此種器出土時有四，今僅見其二。此二者之形制文飾全同。現存國內者（圖二八）高不過三寸五分，長不過六寸五分，其首如鼠，豎耳翻唇，兔尾，牛蹄，背上有缺損處，背上所負之容器出土時已毀棄。此種怪獸尊於歷代著錄內不過數見，皆似無角之鹿而牛蹄，疑其獸形之來源或亦有所本。

《山海經·北山經》 又東北二百里曰天池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其名曰飛鼠。

《爾雅·釋地》 西方有比肩獸焉。……其名謂之𪚩。

《呂氏春秋·不廣篇》 北方有獸，名曰𪚩，鼠前而兔後。

《爾雅·郭注》 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以行，土俗名之爲𪚩𪚩，音厥。

天池之山與夏屋山皆在山西北部，去李峪不遠。此器鼠首兔尾近似傳說中之𪚩𪚩，雖未敢斷其全爲寫實，然亦未必全屬虛構。

11. 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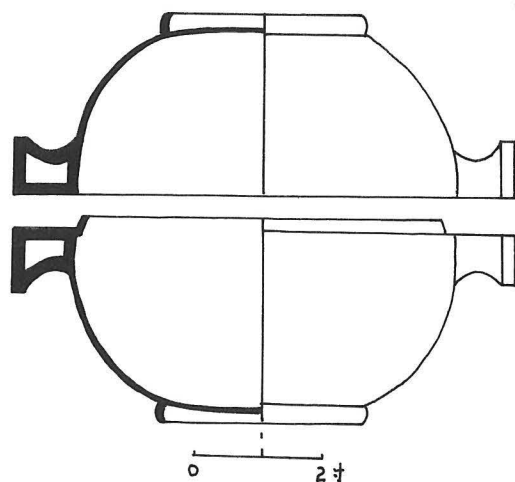
一（圖八）則器胴作半圓球體，加蓋成橢圓狀，胴口部稍向內折斂，錯牙式唇，附兩環耳，下有圈足，蓋上有三似野鴨狀之水禽，邊緣上更伸出小獸頭，以防蓋之易脫落。一（圖二六）則器胴作半圓球體，附兩環耳，錯牙式唇，下具圈足，蓋作層台狀凸起，上有三鳥首，中有一環形紐。

12. 變形敦（圖一〇、三三）

此器有二，一失其半。其形制爲歷代著錄內所不見，測繪圖如左（插圖二）。器與蓋皆作半圓球體，合之則成圓球狀，與陳侯午鐺，陳侯因脊鐺同。²²

²² 可參看徐中舒先生之《陳侯四器考釋》，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1932)。

器與蓋各有短圈足，各有二柄，合之則似上下兩旁各有一圈足形。梅原末治稱之爲異形樣盒，郭沫若氏認爲乃原始形制之敦。²³ 管見以爲其器蓋皆作半圓球體，乃敦之形制，其上下兩旁之作圈足式乃敦之上下兩旁之環變爲殷之圈足式，今故稱之爲變形敦，以示其非全爲上下內外皆寰之制。



插圖二

13. 附蓋雙環耳三角形足容器（圖一八、三二）

此式銅容器有二，皆無文飾，其形制極同如同出一範。短頸，侈口，碩腹，肩上有兩環耳，下具三角形足，上粗下尖，中空否不得知，附蓋，蓋上有一環紐。此種銅器不見於歷代著錄內。

²³ 見《古代銘刻彙攷》中〈金文續攷〉。

14. 匕（圖一二）

匕之形制如近世所用之銅羹匙。柄上作刻線式，菱形紋，柄與首相接處作浮雕之獸面，首內飾有刻線式兩蟠螭相向，以刻線式變形栴紋為地文。

15. 透雕匕形銅容器（圖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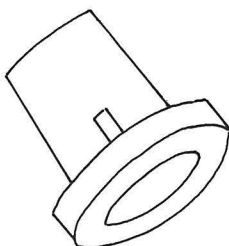
此器形制長柄橢圓首，亦如匕形，唯柄則中空作筩狀，首則中部作蟠螭與獸首形之透雕，各螭體與獸首上更飾以刻線式紋，使其所透雕之母題更可清晰辨出，筩柄上有刻線式之貝帶紋、龜、魚紋等。

16. 劍（圖一四）

王涅克所得之劍，鋒尖稍有折損，餘長五十三公分，²⁴ 美京所藏者之長度蓋與此劍之原長相等。此二劍之重量不可知，僅按其身長約當莖長之五倍，乃《考工記》所謂之上制。其脊作平面，具金錯書，鐔衛作菱形，約廣於臘廣一公分餘，莖中匝後三，首如笠狀，側視如  形，王涅克所得者首凹入處尙嵌有玉。

17. 害飾器（圖三六下）

乃施於車軸頭者，長短不詳，僅其形制如左圖（插圖三）。其形如筩，兩端皆空，本大末小，本端有界線周匝之，近界線處有長方孔之穿，兩面對。文飾不清晰。



插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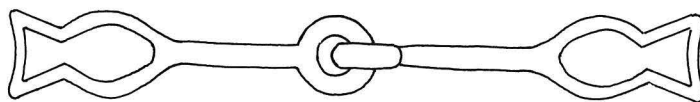
²⁴ 見《遼東古物館雜誌》第二期 Olov Janse 之 "Notes sur Quelques Épées Anciennes Trouvées en Chine".

18. 轄（圖三六上）

此器之圖影爲車害飾器掩其大半，僅知其首作獸首狀，首下有柄，柄之形制不詳，末端有穿否亦不得知。

19. 銜（圖三七）

長度不得知，形制如左圖（插圖四），乃兩節相銜者，其末端之三角形環，蓋爲施轡之處，橢圓形環蓋爲施鑣之處。無文飾。



插圖四

乙、文飾

1. 蟠螭紋

此種文飾可分爲三種。

- a. 鱗飾蟠螭紋。於螭體飾有鱗紋者，如浮雕獸飾蟠螭紋水禽紋殘壺上所見。
- b. 雙鉤蟠螭紋。螭體僅用線條鉤出者。如失蓋蟠螭紋折足鼎則用線條鉤出三半段螭爲文飾之單位，各單位連續排列形成各螭體單獨蟠屈之形，臥獸飾蓋蟠螭紋款足鼎則用三雙鉤螭體相交結爲單位圖，各單位連續配列。
- c. 變形柎文或變形雷文飾蟠螭紋。此種螭體用線條鉤出，然後再於螭體上飾以變形柎紋，飾圓線化雷文者，僅見失蓋蟠螭紋款足鼎及其殘蓋上。此種蟠螭紋或各單體蟠屈連續排列，或各螭體相交結連續排列，或此一螭首與彼一螭尾相接連排列。梅原末治曾據多數此種蟠螭紋之拓本，發見此種文飾乃依一定之單位圖紋反復配列所形成者。

2. 獸面紋

如在甗下器肩，殷蓋邊，附腳盤胴，轄首之獸面，及匕形器上透雕之獸面，各具功用上之價值，當視為形制之一部份。其餘如鼎足、盤足、殷耳、犧尊足、腹浮雕獸飾蟠螭紋水禽紋壺腹上，所飾之內刻獸面紋，及劍之鐔衛上鑲嵌之獸面紋則為文飾。

3. 動物紋

母題為四足獸，如虎、犬、鹿、兔與水禽、魚、龜、蛙、水蟲等。其表出之方法或用浮雕，如浮雕獸飾蟠螭水禽紋壺上之四足獸、水禽，與附腳蟠螭紋盤內之疾足式怪獸及水禽、魚、龜。或用刻線式陰文表出，如蟠螭盤底之虎、魚、水禽、水蟲，及附耳蟠螭紋盤內之虎、犬、鹿、兔、魚、蛙、龜、水蟲等。此等圖文皆具寫實狀態，生動有力。

4. 繩紋

中國古代銅器飾有繩紋，以新鄭出土物之時代為最早。《太平御覽》引通俗文曰：「合繩曰糾，單展曰紉，織繩曰辯。」李峪銅器中之禽獸飾蓋蟠螭紋鼎，失蓋蟠螭紋款足鼎，失蓋蟠螭紋折足鼎，腹上之圓周棱皆作紉紋。浮雕獸飾蟠螭紋水禽紋壺足，與變形敦足，則具辯紋。蟠螭紋匝足，怪獸尊之頸腹，提鏈結繩紋卣頸，所飾者為糾紋。此外提鏈結繩紋卣，結繩紋嵌石紋罍上，更飾有浮雕之結繩成網狀之文飾。

5. 葉紋

殷末或西周之銅器上，多具連續排列之三角紋，角內多作蟬形，故有稱之為蟬紋者。李峪銅器中之禽獸飾蓋蟠螭紋鼎腹上，與提鏈結繩紋卣頸上，則具一種順序排列之葉狀紋。此種葉狀紋之用法，仍存古銅器上蟬紋之遺風，唯葉上則飾以變形栴紋、變形雷紋。

6. 花紋

僅見於缺蓋蟠螭紋款足鼎，及瑞典皇太子所得之此鼎殘蓋，乃填補蟠螭紋以外之空地者。此種地文於歷代著錄之銅器上所不見。

7. 菱形紋

僅見於銅匕柄上。於二平行陰文線內，用陰文直線表出諸多「工字紋」，「工字紋」上更飾以刻線式三角紋，兩工字文之間之空地遂似菱形方格。此菱形紋之表出法近似徐中舒先生於〈古代狩獵圖象考〉內所舉出之乙種菱紋。^{*}

8. 圓線化卍字形紋

日人稱之爲「巴紋」，多見於西周器上。李峪銅器中之臥獸飾蓋蟠螭紋長鼎之蓋上，有此種文飾二，禽獸飾蓋蟠螭紋圓鼎之蓋上，有一，但皆僅有三支，用刻線式紆曲之線鉤出輪廓，內飾以變形栴紋，外圍一刻線式之圓周帶，帶上更飾有變形栴紋。

9. 變形栴紋

多用以飾蟠螭紋體及圓線化卍字形紋上。又用爲地文，如匕上與怪獸尊上所見。其居主要地位者僅見於附蓋虎飾蟠螭紋豆之口部，及圖七殘鑑（？）片之口部。

10. 圓線雷紋

於缺蓋蟠螭紋款足鼎，及其殘蓋上則用以飾蟠螭紋。於怪獸尊則用雙鉤法表出，獸首飾蓋鑲嵌紋鼎則嵌以石。

11. 貝帶紋

於匕形器柄端則排貝紋成帶圍繞一周。

^{*} 徐中舒，〈古代狩獵圖象考〉，《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1935)，頁569-617。

12. 鑲嵌紋

羅斯陀夫柴夫於《漢代之鑲嵌銅器》內曾以爲中國銅器之有鑲嵌者時代較晚，將吾人可斷爲戰國時物者亦列之漢器。^{*} 中國銅器上之有鑲嵌工藝本見於殷代晚期之物，春秋戰國時代此風仍盛。²⁵ 李峪銅器中鑲嵌工藝亦相當發達，如少盧劍銘文之嵌金，鐔衛嵌綠松石作獸面紋，獸頭飾蓋鑲嵌紋鼎除嵌有變形桓文外，更嵌諸多石珠，獸頭飾蓋嵌珠紋鼎腹上嵌有諸多石珠，足端獸面紋之睛亦嵌石，嵌石紋結繩紋壺亦有鑲嵌之飾紋。此外犧尊之目睛成凹狀，當亦有鑲嵌之物已脫落。

總之就吾人今日所見之李峪銅器之容器，與殷末西周春秋早期之銅容器比較觀察，其形制多具演進之跡，其質地亦較薄，而具輕快之意味。此外尚有引人注目之作風二，一即附有立體雕禽獸及禽獸首之發達，二即環形耳之發達。此種環形耳於鼎則代長方耳，於匜則代盞，尤具特彩。其文飾之母題則多數不見於春秋中葉以前之器，少數可見者，亦多變其形。此等文飾除浮雕獸飾蟠螭紋水禽紋殘壺及犧尊等器者外，多用平面之表出法，或刻線式表出法，無較古銅器上浮雕或肉刻之風。主要之蟠螭紋亦多依一單位圖反復配列於器上。其寫實作風動物文飾之發達，更引人注目，爲春秋中葉以前所不常見者。

七、年代之比定

中國古代銅器中所謂殷周器者不論如瑞典學者更分爲殷式 (Yin Style)、殷周式 (Yin-Chou Style)、中周式 (Middle Chou Style)，²⁶ 大都器形嚴肅莊重，文飾奇古。至如所謂漢器者則器形已有演變，質地較薄，帶輕快意味，又大都無文飾，其具文飾者亦皆流麗化與前者完全異趣。又殷周器之造成，形制與文飾多爲緊密之結合，互相牽制，配布齊整；漢器之造成，其具文飾者文飾不受器形之限制，多自由配布，且刻線流麗柔媚，不若殷周器運線之雄勁有力。而李峪出土之銅器，其形制則多與殷周器者有別，而近於漢器，但與漢器對照，則又多具古調，

^{*} M. Rostovtzeff, *Inlaid Bronzes of the Han Dynasty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 (Paris, Brussels: G. Vanoest, 1927).

²⁵ 見徐中舒先生之《古代狩獵圖象考》，載《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

²⁶ 見《遼東古物館雜誌》第六期之 "The Exhibition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

且鼎盤足上之肉刻獸面紋亦為漢器上所不常見。其文飾則多用平面之表出法，少殷周器上浮彫或肉刻之風，且多依一單位圖反復相連配布器上，不若殷周器者受器形之限制，但與漢器對照則尚未達完全解放之勢，其主要文飾之母題又非為確定屬漢器者所有。故梅原末治於數年前即謂所謂「秦器」者乃處於殷周器漢器之中間型，為戰國晚期之物；「秦器」二字可視為劃分時代之名辭，此一時代始於公元前五、六世紀之新鄭遺物，而迄戰國之末，此長期間之銅器皆發展於一新型之下。²⁷

余於梅原末治所劃分此一新型之時代認為大體無誤，惟於其論李峪銅器乃戰國晚期之物，尚難同意。

自民國十二年渾源李峪村、新鄭李氏園發見銅器群後，於十八年洛陽太倉，二十二年壽縣朱家集更有極多銅器之出土。此等銅器據余所知者大多數皆屬於此一新型之物。雖其有國別之不同，但以彼時之交通已臻相當發達，究竟其地域上之文化色彩影響此等器物之製造至如何程度，尚難言也。譬如壽縣朱家集所出之楚器形制文飾似多具特彩，但有為外來之鑄客所造者，是否此等器物完全屬於楚地之文化特彩亦難言也。又朱家集所出銅器雖於此一新型之時多具特彩，但瑞典工程師喀爾白克 (O. Karlbeck) 所得淮水流域出土之楚器，²⁸ 如與洛陽、渾源等地之出土物相對照，則未見有若何屬地域上之文化特彩。余雖未敢言當時各地之出土物絕不受其地方文化之影響而具特彩，但今日認為具地域上色彩之文物，亦未必他地之所無，究竟何者為地方上之色彩，何者為各地共有之色彩，尚有待於考古界之努力。今日可言者在此一新型之內，而各地之出土物雖各有稍感不同之色彩者，此或於時代上有所差別耳。故以李峪之銅器與新鄭、洛陽、壽縣所出者相對照，則於其時代之推訂當不無收穫。然不幸所謂洛陽古墓之出土物，如懷履光 (W. Ch. White) 之 *Tombs of Old Lo-yang* 所載，又似雜有漢器，吾人於此雖可慎重去取當無大錯誤，但此等器物究竟出於若干墓葬，共歷若干世代，仍待研究。又其出土物中之甬甗鐘、嗣子壺，雖具銘文可考相當之時代，但此時代亦僅能限於其本身，不能代表其他出土物也。

洛陽古墓所出器物於本問題既不能充分運用，故余不得不先以新鄭、壽縣所出，而比定李峪銅器之時代。劉節先生於《楚器圖釋》曰：

²⁷ 見〈論所謂秦銅器〉。

²⁸ 見《遼東古物館雜誌》第六期之 "The Exhibition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

日本濱田耕作氏所謂秦器中作變形雷文者，即吾國學者所謂蟠螭文也。此項文樣其簡單組織，則從蟠虺文而來。新鄭出土銅器大都蟠虺文（圖三八：1）。渾源所出者亦有同樣之花紋（圖三八：2）；然同地所出之物中亦有較複雜者（圖三八：3），即所謂蟠螭文矣。其出於歸化之鼎（去尋按此即李峪所出之鼎）為代表作，確類螭蟲蟠屈之狀（圖三八：4）。然至楚器時代，則更複雜，由拳屈之螭身而變為兩正方形套結之狀（圖三八：5），螭身初由蟠虺紋之一線而來（如上：1），自是此線由一畫而變為雙鉤（如上：2），此雙鉤之螭身中更添入雲紋之小圈（如上：3），由一小圈更變為S形之數小圈繚繞而成（如上：4、5）。*

今僅就文辭一項如劉氏所論，亦可知李峪銅器之時代，當晚於新鄭者早於楚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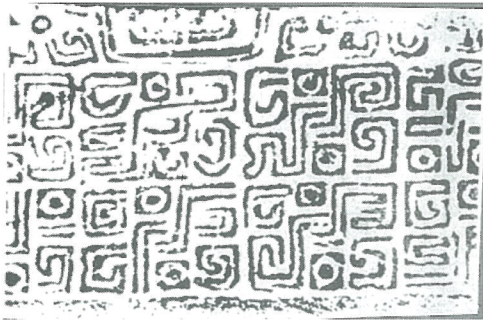
然余當於此更贅數言以述楚器、新鄭器之時代。劉氏所指楚器之作正方套結蟠螭文飾者，據余所知僅限於楚幽王龔悍時器。其父考烈王龔肯（於公元前262年即位238年卒）之鑄鼎，雖有具如此文飾之蓋，但與器相對照，則誠如唐立庵先生所云，乃別一器之蓋所誤配者。²⁹ 然就余今日所知之考烈王物，其文飾具蟠鳳紋與複雜交結之變形雲紋。此等圖紋過去多以為乃漢器上之特彩，實則為後起之作風而為漢器所沿襲耳。但於李峪銅器雖有此種文飾之母題，而表現之方法則不相同，是亦李峪銅器當早於楚考烈王之時代也。新鄭墓葬之時代，學者間向各據王子嬰次鑪以為說。王國維謂王子嬰次鑪乃楚令尹子重之物，於魯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鄢陵之役，為鄭人所得，新鄭之墓當成於此年之後。³⁰ 郭沫若氏謂王子嬰次鑪乃鄭子嬰齊為公子時所造，時其父莊公會僭稱王號，故得稱王子，嬰齊即位十四年（公元前680年）被弑，新鄭之墓當成於此年後之三、五年間。³¹ 今按古代墓葬之所埋藏，未必全為死者生前之所服用，或全為其子孫所造之明器、祭器等，往往其先世之物亦用以殉，例如壽縣朱家集之楚幽王墓內亦有其父考烈王之物也。新鄭墓內所出之器物，如所謂編鐘、特鐘、殷、鬲、甗、圓形壺等，形制文飾頗具古調；如所謂鼎、鬲、方壺、匜、鍤、鑪等，形制文飾則又屬

* 見頁19，增補附圖。濱田氏所謂秦器變形雷文云云，劉節原注云「見所著之東亞文明之黎明頁四十至四十二。」按當是汪馥泉中譯本，頁57-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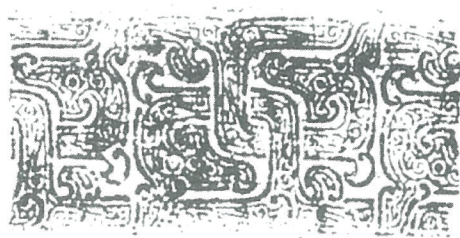
²⁹ 見《壽縣所出銅器考略》，載北京大學《國學季刊》4.1(1934)。

³⁰ 見《王子嬰次盧跋》，載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十八（海寧王氏排印石印本，1927）。

³¹ 見《新鄭古器之一二考核》，載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上海：大東書店，1931），下冊。



圖三八：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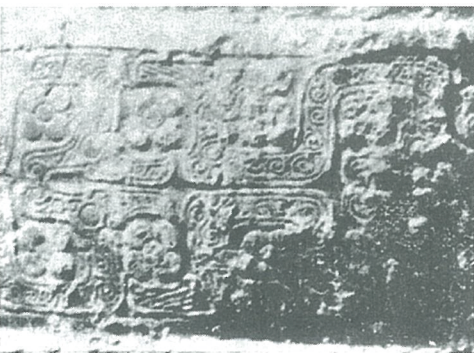
圖三八：4



圖三八：2



圖三八：5



圖三八：3

圖三八：新鄭與李峪蟠螭紋及其變化
(劉節，1935，圖版29-33)

一新型。³² 此等具兩種不同作風之器物，是否乃本在兩墓或數墓，為非科學的發掘所混亂不得知。果即在一墓，其形制文飾頗具古調者，亦當為墓內葬者先世之物。推斷此墓之時代亦當以其屬於新型之器物為標準。如王子嬰次鑑之形制文飾於新鄭器物內最具特彩，其銘文書法與王子申盞者若同出於一人之手筆。王子申盞，阮元以為乃楚平王長庶子，令尹子西之器。³³ 此鑑之為楚令尹子重之物說，似尚可信。又如《新鄭古器圖錄》中，圖三十二之匜，圖三十之鍤，與齊侯四器中之匜鐃之作風相近似。³⁴ 圖三十七、三十八之方壺，則文飾之母題，與其排列，與曾姬無卣壺極相同，其形制亦與曾姬無卣壺相同，僅器底多立體式獸足，蓋頂不具四出之飾而已。齊侯四器，乃齊侯朕其女孟姜所造，當為姜姓之齊。其銘文字體頗類陳枋殷，³⁵ 蓋為春秋末季齊悼公或簡公、平公之物。曾姬無卣壺之時代，各家之說法不同。按其銘曰：

佳王廿又六年，聖趙（桓）之夫人曾姬無卣，望安茲漾陞蒿間（間）之無
嗎，甬（用）作宗彝尊壺。逡嗣甬之，職（職）才（在）王室。

此曾當如唐立庵先生所疑，乃漢陽諸姬之一。³⁶ 漾陞有如叔夷鏹之淄潛，當作漾水之濱解。漾水乃漢水上游之稱。此言漾陞，殆如《左傳》之所謂漢陽，蓋曾姬故國之所在。蒿間，蓋猶後世之言蒿里也。無嗎，郭沫若氏謂言鰥寡孤獨而無告者。³⁷ 是則此壺之作，蓋因曾姬念其安葬於漾陞之先世之無嗎也。此時曾國當已被楚所滅。楚王龔章（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作鐘用享之曾侯乙非為楚之宗族所轉封者，即為楚雖滅曾而仍存其祀。此壺之作當不晚於此年。其出於壽縣，而云唯王廿又六年，當指楚王之二十六年。其銘文字體則近於秦景公（即位於公元前576年卒於537年）之「秦公殷」，³⁸ 但殷之形制與一部文飾則屬於瑞典學者所謂之「中周式」，似其時代當較此壺稍早。此壺之作當在楚昭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0年）或惠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63年）。新鄭墓內既有一部器物仍存古調，一部器物之作風同於公元前五世紀前半之齊侯匜鐃，曾姬無卣壺則其時代最

³² 見《新鄭古器物圖錄》。

³³ 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七。

³⁴ 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東京：文求堂書店，1935）。

³⁵ 見同上。

³⁶ 見《壽縣新出銅器考略》，載北京大學《國學季刊》4.1(1934)。

³⁷ 見《古代銘刻彙考續編》內之《壽縣所出楚器之年代》。

³⁸ 秦公殷之時代歷來有諸多不同之說，余就其形制文飾觀察認為其作成時代不當過早，而贊成秦景公（576-537 B.C.）時說。

晚亦不過公元前五世紀之前半。據此則李峪所出銅器之時代，亦當晚於公元前五世紀之前半。

今既據新鄭鄭墓、壽縣楚墓之出土物，已推斷李峪出土之銅器當晚於公元前五世紀前半，早於公元前二百六十三年，當再進一步試將其時代更加以限制。

按新鄭墓內之出土物，有一種丸彫之蟠螭紋，其螭體凸出頗生動有力，各螭體之蟠結亦極疏鬆。至虬氏編鐘，則各螭體雖亦生動有力，其相蟠結雖亦疏鬆，但已趨向於用平面之表出法，無丸彫之風。又其「鼓」間除飾有蟠螭紋外，更加雜一怪獸面紋，頗具特彩。李峪出土銅器中多數器物之蟠螭紋則用平面之表出法，其相蟠結則較緊湊，但體亦漸失生動之力而成呆板狀。此等銅器似較虬氏鐘稍晚。唯其浮雕獸飾蟠螭紋壺之蟠螭紋雖用表面表出，但仍具較古浮雕之風，與虬氏鐘近似，螭體之蟠結亦相當疏鬆。又此壺於蟠螭紋間亦雜有怪獸面與虬氏鐘同，其用浮雕獸排列於圓周帶上頗有芮伯壺用浮雕蟬之風。又其穿鼻三孔之犧尊亦飾有浮雕獸與怪獸面，與其壺之作風相同，其變形渦文之表出法則又與嗣子壺同。是此犧尊之時代亦當與虬氏編鐘、嗣子壺之時代相近。

虬氏編鐘之作成，徐中舒、唐立庵、劉節諸先生皆斷為在周靈王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年），³⁹ 瑞典高本漢（B. Karlgren）氏亦響應此說，⁴⁰ 郭沫若氏則斷為當在周安王二十二年（公元前380年）。⁴¹ 徐先生於二十三年春講授殷周史料考訂一課時，又棄其前說，謂以其銘文書法而論，其時亦不當過早，最要者如春秋時器「齊」字作，而虬羌鐘之「齊」字作，與陳侯午器之作相近似；因更據《水經·汝水注》所引《竹書紀年》之文，認為當作於周威烈王之二十二年（公元前404年）。此說已較前之二說減少諸多不妥之處，當可信。嗣子壺之作則無絕對年之可言。郭沫若以為與虬氏編鐘之時代當相去不甚遠，蓋戰國初年之器。⁴² 今按其銘文字體則較虬羌鐘者當稍早，然屬之於戰國初年之器亦無不妥。據此則李峪銅器之大部當作於公元前四世紀時，僅其浮雕獸飾蟠螭紋水禽紋殘壺，及穿鼻三孔犧尊之作成，似當及於公元前五世紀之末。

³⁹ 唐、劉兩先生之作，可見北平圖書館《館刊》5.6(1931)、6.1(1932)、7.1(1933)，徐先生則有《虬氏編鐘圖釋》一書。正勝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七卷一號無相關論文。

⁴⁰ 見《遠東古物館雜誌》第六期之 "On the Date of the Piao Bells".

⁴¹ 見《金文叢考》中之〈虬羌鐘銘考釋〉。

⁴² 見《古代銘刻彙攷》中之〈金文續攷篇〉之嗣子壺。

此外今更就少盧劍作成之時代，試於李峪銅器之時代加以限制。因頗覺此二劍乃墓中葬者生前所用，此可代表李峪銅器大部之時代，與較晚之時代。瑞典人 Olov Janse 曾以中國出土之劍就其形制分爲數類，此少盧劍被列入 A 類。彼謂此類劍於中國各地分佈極廣，所用之時間亦最長，當起於周代。⁴³ 今按壽縣出土之楚王禽章劍之形制，如鐔衛莖首皆與少盧劍有別，且莖間之無後仍存較原始之式。因莖間之匝後非如 Olov Janse 所云爲一種裝飾品，程瑤田以爲乃爲纏繩而設，⁴⁴ 實得其旨，倘僅爲裝飾品則殊有礙於人手之把握。故劍莖之有後可視爲後起之改進。楚王禽章劍之時代因亦早於少盧劍。禽章劍之作當不出公元前四八八年與四三二年之間，少盧劍之作因亦可斷晚於此時。但劍莖有後之興起亦非過晚，戰國時作品《考工記》已有載記，想爲當時極通行之形式。歷代著錄內亦不乏其屬於戰國時代者之實物，惟多無較確當之時代可考耳。僅朝鮮大同江郡有此種銅劍伴有「上郡戈」出土，⁴⁵ 戈上有刻款銘文，郭沫若氏考爲秦始皇二十五年所造，⁴⁶ 則此劍作成之時代當與之相去不遠。但此劍之形制長度雖與少盧劍相近，而其時代則當較少盧劍已晚。因此劍之銘乃公元前三世紀時最流行之刻款，少盧劍之銘文則先鑄成陰文而後錯金，此種鑄款仍爲較古之作風。又少盧劍銘字體則纖秀雄勁，各筆畫亦皆粗細相等，此種手筆與虬氏編鐘者相同，其作成之時代蓋去虬氏編鐘不遠。然又就其形制而論，則距楚王禽章之時代又未必無相當之距離，蓋亦公元前四世紀初葉物也。

於李峪出土銅器之時代既作如上之推訂後，當更於此有所聲明：器物本身所表現之作風不同固可斷其時代不同，但此種不同之作風決非一時之突變，亦非一時整個現象，故通常於短期內兩種作風不同之器物仍並存於世。例如今日之一成衣店內即同時並製短服與長服，一書局內同時出線裝與洋裝書籍。李峪出土之諸多銅器，本皆屬於自春秋末年以來興起之新型，雖其文飾之表出有兩種不同之作風，而各所代表之時代又相去極近，如固執其時代謂非同時之物，或亦不合當時之史實。要之李峪墓葬之作成當於公元前四五世紀之間，所殉之器物或亦盡此時之所有也。

⁴³ 見《遠東古物館雜誌》第二期所載 O. Janse 之 "Notes sur Quelques Épées Anciennes Trouvées en Chine".

⁴⁴ 見程瑤田《考工創物小記》之〈桃氏爲劍考〉。

⁴⁵ 見原田淑人、駒井和愛同輯之《支那古器圖攷·兵器篇》（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2）。正勝按，朝鮮平安南道大同江郡船橋里出土銅劍，長一尺七寸七分，即原圖版二四之6。

⁴⁶ 見《古代銘刻彙攷》〈金文續攷篇〉上郡戈。

八、外來文化影響之問題

近世外人由於研究司克泰 (Scythian) 或司克泰西伯利亞 (Scytho-Siberian) 之文化，遂漸產生中國古代文化曾受此種文化影響之說。據余所知此種學說蓋首倡自 P. Reinecke，⁴⁷ 至羅斯陀夫柴夫 (Rostovtzeff) 乃更為揚厲。秦漢之後中國文化曾飽受西方文化之影響，此固於文獻古物優足證明者。先秦時代如河南甘肅出土之著色陶器，殷墟出土之銅兵器，確具有與西方文化有關之色彩，⁴⁸ 此後似亦有具 Hallstatt 文化色彩之器物出見於中國。⁴⁹ 此皆足示中國古代文化決非孤獨存在發展，而不與外方文化發生關係。若司克泰西伯利亞式文化，雖西自匈牙利、南俄，東至中國北部皆有所發見，但其與中國古代文化之關係如加以慎重之研究，不難有較明確之認識；唯於此有一先決之條件，即須於中國古代文化有正確之理解也。如羅斯陀夫柴夫曾以為中國周代銅器上之饕餮等動物文飾，可於司克泰藝術尋出其源泉，最低程度二者乃共從伊蘭藝術母胎內產出之見解，⁵⁰ 誠為考古界之趣聞。* 余於拙作之〈殷商銅器之探討〉內曾以為周代銅器之文飾乃源於殷，殷器之文飾，如饕餮夔龍雷文等與太平洋島嶼上之原始藝術，及墨西哥古代藝術同其母題；因響應 Ernest F. Fenollosa 之說，認為殷商銅器之文飾蓋屬於

⁴⁷ P. Reinecke 之著作余未見，僅於安特生在《遠東古物館雜誌》第一期所發表之 "Der Weg Über die Steppen" 一文內得稍知其意見。正勝按，一八九七年德國考古學家 P. Reinecke 在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發表 "Über einige Beziehungen der Alterthümer Chinas zu denen des skythisch-siberischen Völkerkreises"，從題目看來是討論古代中國與司克泰西伯利亞民族圈之間的關係，此文間接引自 J. G. Andersson, "Der Weg Über die Steppen", *BFEA*, No.1。

⁴⁸ 可參看安特生之〈甘肅考古記〉及李濟之先生之〈殷墟銅器五種及其相關之問題〉，李先生此文載於《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上冊。

⁴⁹ 見 O. Janse 在《遠東古物館雜誌》第二期所發表之 "Quelques Antiquités Chinoises d'un Caractère Hallstattien"。

⁵⁰ 見 *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

* Rostovtzeff, *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 pp.200-201. "I have not the slightest doubt that both countries (i.e. Scythian and Chinese) received the animal style from a common source: I mean Iranian Central Asia. The Chinese adopted the elements of this style, dealt with them free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rtistic temperament, and formed a new and peculiar decorative style: the Scythians developed their style in close connexion with Persian and Greek art. This explains why the two styles, in their final shape, are utterly different. But their common origin is evident."

太平洋藝術 (Pacific Art) 範圍。^{*} 今日思之中國古代銅器文飾之色彩並不如此單純，但視為東方之特殊藝術仍無不可。羅斯陀夫柴夫之說則不足信。吾人今日所知司克泰西伯利亞式之文物雖可代表千餘年之文化歷史，但尚無可確斷早於公元前七、八世紀者，將何由而為周代藝術之源泉？故羅斯陀夫柴夫於一九二九年更聲言曰：

In my book on the *Iranians and Greeks* I was inclined to accept a common origin, from which both the Chinese and the Scythian animal style were derived. I must say that I was wrong. The real Scythian style as described above is different if compared with the early Chinese animal style of the Chou period. It is more primitive, more realistic, less conventionalized. It does not operate with fantastic animals. The fantastic animals entered the repertory of the Scythian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late, probably not before the fifth to fourth centuries B.C.⁵¹

羅斯陀夫柴夫最初之謬見，乃源於一種偏激之見解，重視司克泰人之文化，於中國古代文化無正確之理解。竊以為文化程度較低之司克泰西伯利亞文化與文化程度發展已高之中國文化相接觸，亦不過前者為後者所吸收，成為廣大文化中之新血液，而常處於被動地位，舊有文化稍受其影響而已。李峪出土銅器即其絕好之一例。今先指出李峪銅器於此問題之重要，然後再觀察外來影響之色彩。

甲、戰國時代北方異族之文化

余於此說明戰國時代中國北方異族之文化，無需於視《史記》、《漢書》所載匈奴人之生活習慣為戰國時代一般北方異族之情形，與西方史家考古家所述之司克泰人生活習慣相對照觀察，亦無需於就《論語》、《左傳》、《史記》、《國策》之文以推斷戰國時代北方異族有披髮左衽，袴褶服，騎射之情形，與司克泰人相同。因與本問題有關者乃其文物，故亦僅述其遺物。此種遺物大都屬於青銅刀、劍、容器、衣帶裝具、馬具及其他飾件。其出土地點除安特生 (J. G.

^{*} 〈殷商銅器之探討〉，北京大學潛社《史學論叢》第一冊(1933)。Ernest F. Fenollosa, *Epoche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London: W. Heinemann, 1921).

⁵¹ 見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H. Mil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9). 正勝按，頁73-74。

Andersson) 在甘肅鎮番縣沙井村古墓有所發見外，* 大都出土於熱河、察哈爾、綏遠及山西、陝西北部，尤以綏遠各地出土為最多，故安特生稱之為鄂爾多斯青銅器 (Ordos bronzes)。⁵² 此等銅器於一九二三年由法商王涅克之搜集始見稱於世，此外如米松林 (Herbert Mueller)、⁵³ 安特生、喀爾白克 (O. Karlbeck)、拉遜 (F. A. Larson)⁵⁴ 及名古董商盧芹齋 (C. T. Loo)⁵⁵ 等亦各有大批之搜集。此等銅器之作風與中國古代文物顯有不同，其最顯著之獸型 (Animal Style) 吾人倘見其一二即知乃屬於司克泰西伯利亞式。博羅夫加 (G. Borovka) 於其 *Scythian Art* 曾論司克泰式之獸型曰：

This style is thoroughly individual, so individual that it long remained quite unintelligible; only in recent years have we begun to understand it. This style is at once so lively that a modern eye is instantly caught by it, and so fanciful that the observer at first can scarcely make out the details of the presentation. It produces the effect of an impressionistic ornamentation, but its components are living bodies.**

吾人如以博羅夫加此言以察中國北部出土物獸型之作風，亦覺其與司克泰者有相同之特質。故 Hubert Schmidt 總稱黑海北岸 Kama 河流域葉尼塞河 (Yenissei River) 上游，及中國北部出土物，為「歐亞獸型」(der eurasische Tierstil)。^{***}

唯西方學者於中國北部此種出土物之時代之推斷，多難令人滿意。如 A. Salmony 以為盧氏之搜集品皆自漢至宋元居於中國北疆之異族所有。⁵⁶ 安特生雖將沙井村之發見品斷為屬於公元前六世紀至公元前一世紀時之物，⁵⁷ 然據何標準

* J. G. Andersson, "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 *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Series A, No.5(1925): 18, 云墓中出小件銅器，大量子安貝，綠松石粒等物。

⁵² 見安特生之 "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 載《遠東古物館雜誌》第四期及 "Selected Ordos Bronzes", 載同上之第五期。

⁵³ 見 *Catalog of the Sunglin Collection of Chinese Art and Archaeology*, 1930年出版。

⁵⁴ 見安特生之 "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 及 "Selected Ordos Bronzes"。

⁵⁵ 見 A. Salmony 之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 (Paris: C. T. Loo, Publisher, 1933)。

** 此據 V. G. Childe 英譯本校正，頁30。

*** Hubert Schmidt 之說問引自 J. G. Andersson, "Der Weg Über die Steppen"。

⁵⁶ 見 A. Salmony 之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

⁵⁷ 見安特生之 "Der Weg Über die Steppen", 載《遠東古物館雜誌》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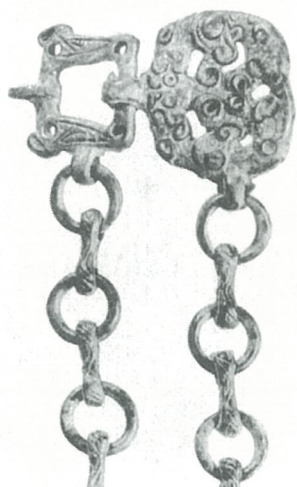
則不得知，又將其 "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 一文所列舉之器物斷為大部當屬於漢及稍前匈奴人之遺物，而仍無可信之界說。阿恩 (T. J. Arne) 於一九三三年始用南俄西伯利亞之出土品以比較灤平、宣化兩地古墓之發見物，使吾人得知此種中國北部出土物，有確屬秦漢以前者。⁵⁸ 今按安特生曾指出此種出土物有可注意之情形二：一常伴有純中國式物出土。二其草原式之獸型常有漢化之色彩。⁵⁹ 此二情形皆可為研究其時代問題之最大佐助。然吾人今日所見者大部乃外人之收買品，伴出之物不詳，難得如外人研究考次洛夫 (Kozlov) 在庫倫附近所發見者之便利，⁶⁰ 故余於此不得不就第二情形試於少數器物之時代與以推斷。例如安特生之 "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 (下簡稱 "Hunting Magic") 圖版十四之1, 3, A. Salmony 之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 (下簡稱 *Sino-Siberian Art*) 圖版十四之2、三十一之1皆飾有變形栴紋 (圖三九)。
"Hunting Magic" 圖版八之2, 十一之7, 10, 十四之3, 二十二之8, *Sino-Siberian Art* 圖版二十七之2, 三十九之2, 4, 皆飾有圓線化雷紋 (圖四〇)。
"Hunting Magic" 圖版十一之9, 二十四之5, *Sino-Siberian Art* 圖版二十二之4, 5, 二十三之1, 2, 4, 二十八之3, 二十七之4, 皆飾有繩紋 (圖四一)。
"Hunting Magic" 圖版十一之4, 6, 十二之4, 十五之7, *Sino-Siberian Art* 圖版二十四之4, 三十之9皆飾有穀粒形紋 (圖四二)。
Sino-Siberian Art 圖版三十一之3, 三十九之5則飾有獸面紋。
Sino-Siberian Art 圖版三十二之5則飾有渦紋。
Sino-Siberian Art 圖版三十七之2則飾有貝帶紋 (圖四三)。
* 此種變形栴紋、圓線化雷紋、穀粒紋、繩紋、獸面紋、渦紋、貝帶紋，皆中國春秋末年及戰國時代之器物所常見之文飾，故可推斷其器物之時代亦與春秋末及戰國相去不遠。甚至 *Sino-Siberian Art* 圖版十八之5 (圖四三) 其形制全為所謂鄂爾多斯青銅器中之帶鉤式，而於虎身則飾以春秋末葉以前中國銅器最發達之鱗形紋，其時或亦更早也。

⁵⁸ 見 T. J. Arne 在《遠東古物館雜誌》第五期發表之 "Die Funde von Luan P'ing und Hsuan Hua"。

⁵⁹ 見安特生之 "Der Weg Über die Steppen"。

⁶⁰ 俄人考次洛夫等在外蒙古庫倫附近古墓內所發見之古代遺物，雖有純中國式或中國者之器物，其中國之漆杯上更有「上林」，與「建平五年」等文，外人多就此等器物以研究其時代。正勝按，參看梅原末治《古代北方系文物的研究》，頁1-14。

* 補圖三九—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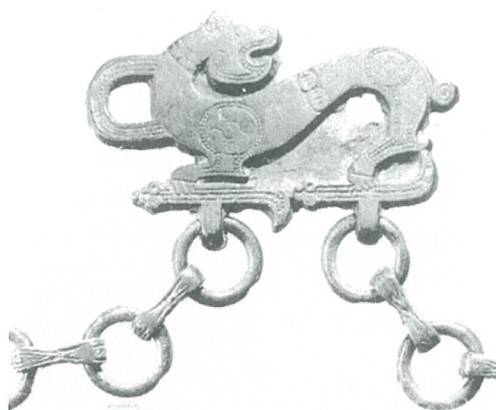
J. G. Andersson, 1932, plate 14:1



A. Salmony, 1933, plate 14:2



J. G. Andersson, 1932, plate 14:3



A. Salmony, 1933, plate 31:1

圖三九：變形栴紋



J. G. Andersson, 1932, plate 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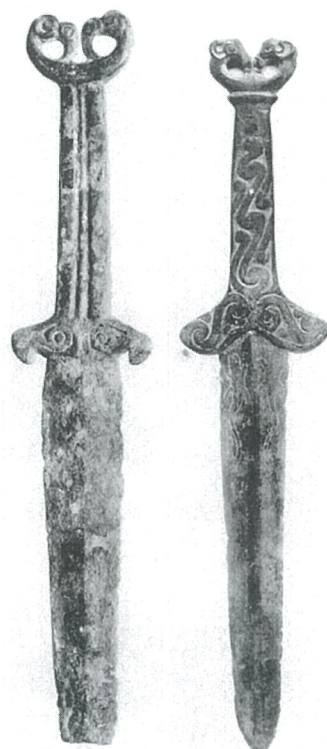
J. G. Andersson, 1932, plate 11:7



J. G. Andersson, 1932, plate 14:3



J. G. Andersson, 1932, plate 8:2



A. Salmony, 1933, plate 39:2, 4



A. Salmony, 1933, plate 27:2

圖四〇：圓線化雷紋



A. Salmony, 1933, plate 22:5



A. Salmony, 1933, plate 2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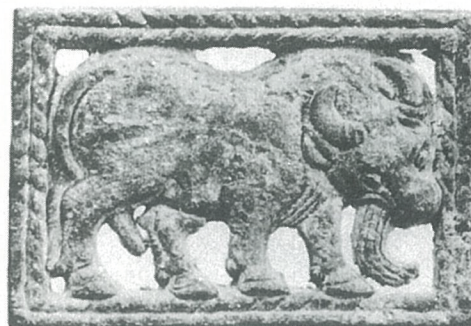
A. Salmony, 1933, plate 23:1



J. G. Andersson, 1932, plate 1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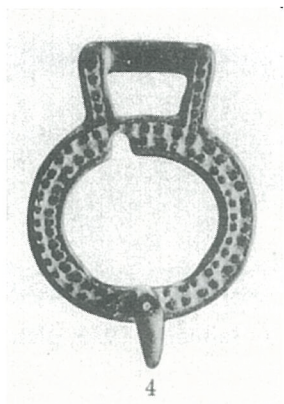


A. Salmony, 1933, plate 23:4



J. G. Andersson, 1932, plate 24:5

圖四一：繩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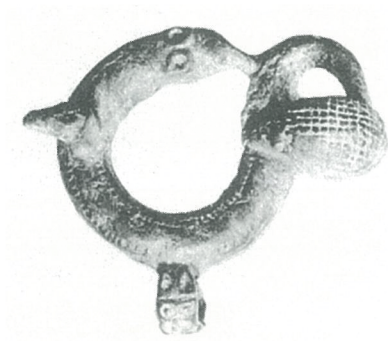
J. G. Andersson, 1932, plate 11:4



J. G. Andersson, 1932, plate 15:7



◀ J. G. Andersson, 1932, plate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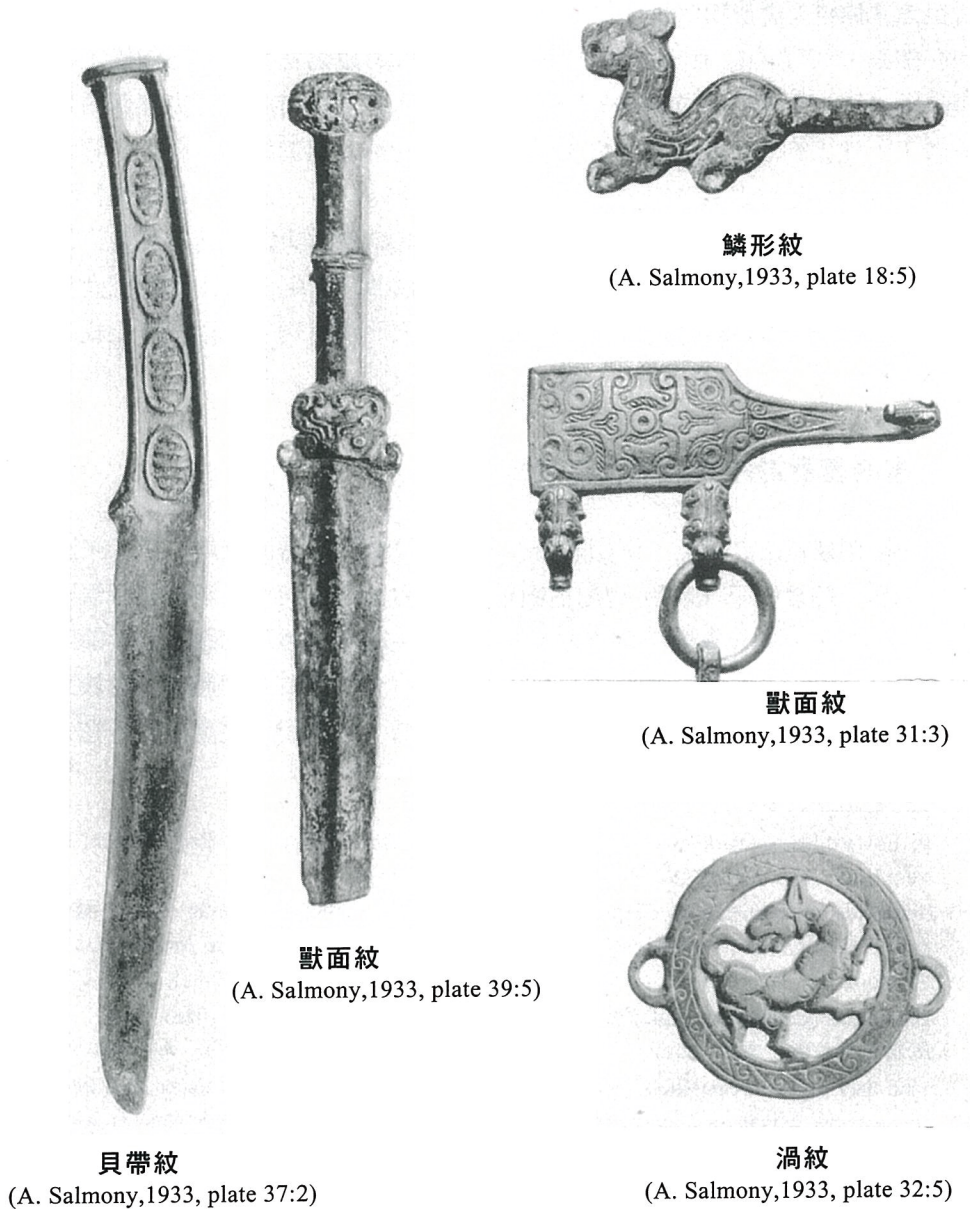


A. Salmony, 1933, plate 30:9



A. Salmony, 1933, plate 24:4

圖四二：穀粒形紋



圖四三：其他比較文飾

又中國北部出土所謂鄂爾多斯青銅器之年代較早者，安特生與 A. Salmony 皆以爲乃匈奴人之遺物似亦大可疑。雖如 E. H. Parker 以爲匈奴人與司克泰人乃同一部族，^{61**} E. H. Minns 與 V. Gordon Childe 以爲司克泰人乃匈奴人之先驅 (forerunner)，^{62*} 雖如考次洛夫之發見可見匈奴人之文物有屬於司克泰西伯利亞作風者，⁶³ 然上列屬於戰國時代之中國北部出土物是否爲匈奴人所有大成問題。因吾人今日所知匈奴之真確歷史不過始自頭曼單于時代，《史記·匈奴傳》雖云戰國末年「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然此時猶爲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人南至河套一帶似當於秦漢之際。⁶⁴ 至於此種戰國時代者之北疆出土物究竟當屬之何種異族，於此無考訂之必要，僅指出此時中國北疆有司克泰西伯利亞式之文化產物足矣。

乙、李峪墓葬於中外交通上之地位

李峪在夏屋山之東北，恒山右脅之北麓，於春秋時當屬代地。其入中國版圖當自趙襄子踰夏屋平代地始。趙自得代地後曾封其宗族於此。李峪墓葬蓋即居代地趙之宗族，或其他貴族所有。古人墓葬去其生時所居多不過遠。公元前四世紀趙之都城先在中牟後遷邯鄲，皆在太行山脈之東。⁶⁵ 此時身居趙都之貴族死後亦當葬其附近，於情於理未必遠踰恒山而葬於李峪，故傳說中之趙王墓多在太行山

⁶¹ 見 Edward Harper Parker,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New York: A. A. Knopf, 1924) 或 *The Empire of Hiung-nu*。

^{**} Herodotus 所知的司克泰 (Scythians)，中國所知的匈奴和歐洲所知的 Huns，據 Parker 說：「三者之間互有一些民族誌的關連。」見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 p.3.

⁶² 見 Minns 之 *Scythians and Greek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3), Childe 之 *The Aryans*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New York: A. A. Knopf, 1926).

* 所謂先驅之說，當據 Gordon Childe 之 *The Aryans*, pp.38-39。Childe 說，"On the other hand they find exact parallels among the non-Aryan Mongol nomads of upper Asia throughout the ages as Minns has amply demonstrated. This author treats the Scyths as Mongoloid forerunners of the Huns, Tartars, and Peschenegs, and that is not doubt right." 按 Minns 之說見所著 *Scythians and Greeks*, pp.88-97.

⁶³ W. Perceval Yetts 於其 "Discoveries of the Kozlov Expedition" 中謂 Kozlov 認爲在庫倫附近古墓內之人種乃雅利安人而非匈奴人，此或爲匈奴聯邦式大帝國所統治之雅利安部族，故今亦稱之爲匈奴人。

⁶⁴ 可參看《史記·匈奴列傳》。正勝按，〈匈奴列傳〉曰：「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

⁶⁵ 中牟、邯鄲之地望可參看顧觀光之《七國地理考》。正勝按，卷四。

東麓及其附近之高地。⁶⁶ 李峪墓葬在恒山右脅北麓，當為身居其北代地者趙之貴族所有。

戰國時代中國北疆之異族皆為草原上之遊牧者。平時則逐水草而遷徙，戰時則人各騎射信意馳騁。其文化程度較低，故善吸收外方之文化，而同時又為外方文化之傳播者。彼等常將東方文化輸入西方，西方文化亦輸入東方。而外方文化之輸入中國，趙之代地實首當其衝。因代地非但為趙之邊疆北鄰異族，且居中外交通之樞紐。戰國時作品《穆天子傳》所載穆王西狩之事雖未可視為史實，然穆王於西北各地採玉、祭鐵山、鑄五彩之石以造物及採集植物攜歸中國等事，皆反映當時西方之工藝品、植物因交通而輸入中國。故日本小川琢治謂《穆傳》一書可視為探寶之作。⁶⁷《穆傳》所載穆王西狩往返皆經桑乾河上游與雁門關一帶，⁶⁸此足見雁門關一帶乃當時中外交通之要塞，其北代地亦中外交通所必經。故蘇厲說趙惠王曰：「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⁶⁹

趙之代地既北鄰異族，而居中外交通之要衝，則居代地趙之貴族墓內殉葬之器物當受北方異族文化之影響極大。因當時中國北方異族已有冶鑄之術，李峪墓內之銅器無堅強之理由可言其非造於代地而來自中國內地也。

丙、外來文化影響之觀察

論李峪銅器受外來文化之影響者，據余所知以梅原末治較為慎重。^{*}梅原僅指出蟠螭紋附腳盤內浮飾之疾走形怪獸，乃受高加索之 Kuban 地方之鐵器時代初期文化影響，其銜與銜板與司克泰式者相同。余之管見頗覺李峪銅器中所飾之繩紋（紉紋、糾紋、辮紋）與刻飾之動物紋亦有外來文化影響之彩色。^{**}

⁶⁶ 可參看《殷禮在斯堂叢書》內之《歷代山陵考》。正勝按，據王在晉《歷代山陵考》，真定府有趙王塚（原注，大者六，小者三十二）、趙武靈王墓，廣平府有趙惠文王墓，大名府有趙宣子冢。

⁶⁷ 見小川琢治《穆天子傳研究》，載《支那歷史地理研究續集》（東京：弘文堂，1940）。

⁶⁸ 同註67。

⁶⁹ 見《史記·趙世家》。

^{*} 梅原之說見《所謂秦銅器に就いて》，《史學》10.3(1931)。

^{**} 以下紋飾所引司克泰文物的斷代多據 Borovka，但和 G. Bongard-Levin 與 H. Kyrieleis 聯合主編的近作 *Steppenvölker Eurasiens*（俄德文合編）所斷的年代比較，Borovka 斷得晚些。紋飾圖據原稿所引增補。

紉紋（圖四四）

Olbia 出土者：見 *Scythian Art* 圖版九，公元前六世紀時之物。

Kuban 出土者：見 *Scythian Art* 圖版二十四、二十五，公元前七世紀至公元前六世紀之物。

中國北部出土者：見 *Sino-Siberian Art* 圖版二十二之4, 5，圖版二十三之2。

糾紋（圖四五）

Don 地方出土者：見 *Scythian Art* 圖版二十二之B，公元前五世紀之物。

Dniepr 地方出土者：見 *Scythian Art* 圖版二十三之B，公元前五世紀之物。

Kuban 出土者：見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 圖版四之1, 3，公元前七世紀至公元前五世紀之物。

中國北部出土者：見 "Hunting Magic" 圖版十一之9，*Sino-Siberian Art* 圖版二十八之3。

辮紋（圖四六）

Kuban 出土者：見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 圖版四之1（參圖四五），公元前七世紀至公元前五世紀之物。

Don 地方出土者：見 *Scythian Art* 圖版三十七之C, D，皆約為公元前一世紀至紀元一世紀之物。

中國北部出土者：見 *Sino-Siberian Art* 圖版二十三之1, 4，圖版二十七之4與 "Hunting Magic" 圖版二十四之5。

中國古代銅器其年代較早者之文飾大都為一種近於幻想 (fantastic) 者，其飾以繩紋或結繩紋則近於原始的寫實之藝術，其時代最早者始自造成於公元前五、六世紀之際之新鄭墓內所殉，前於此者則不見。上列具有此種文飾之中國北部出土品，前已推訂屬於春秋末季及戰國時代之物。雖未能確定其早於新鄭之出土品，然於公元前六、七世紀時黑海北岸之銅器，已有此種文飾，則中國銅器之有此當受歐亞大草原上文物之影響。其或由西方傳入中國北部之異族，再南入中國。李峪銅器群中此種文飾特殊發達者，殆因鄰近北方異族也。



G. Borovka, 1928, plate 24



G. Borovka, 1928, plate 9



A. Salmony, 1933, plate 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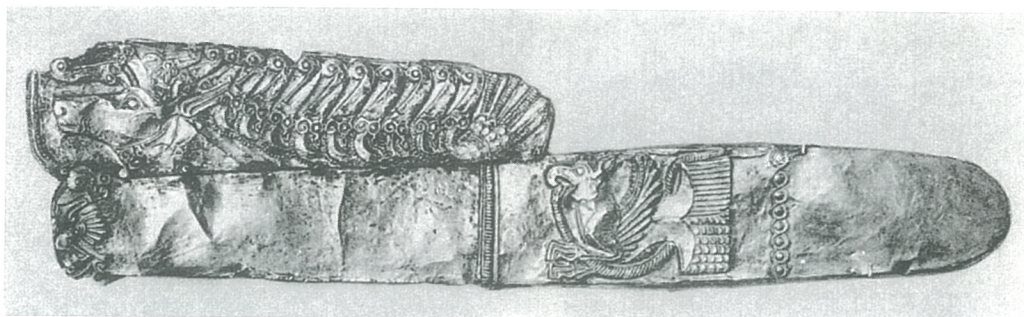
▲ A. Salmony, 1933, plate 2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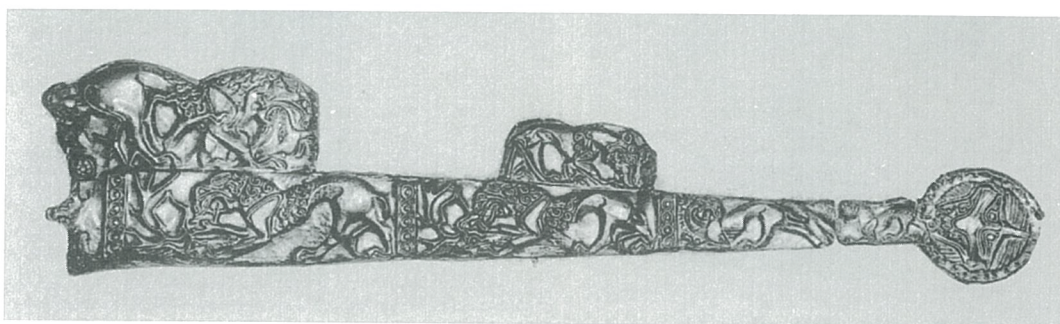
◀ A. Salmony, 1933, plate 22:5

圖四四：綉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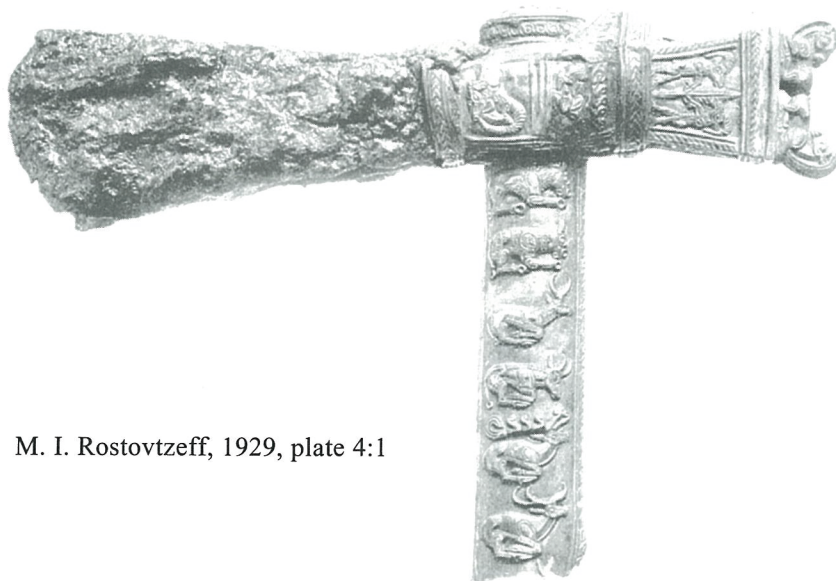
高去尋



G. Borovka, 1928, plate 22:B



G. Borovka, 1928, plate 23:B



M. I. Rostovtzeff, 1929, plate 4:1

圖四五：糾紋



M. I. Rostovtzeff, 1929, plate 4:3



J. G. Andersson, 1932, plate 11:9



A. Salmony, 1933, plate 28:3

圖四五：糾紋（續上頁）



A. Salmony, 1933, plate 23:1



A. Salmony, 1933, plate 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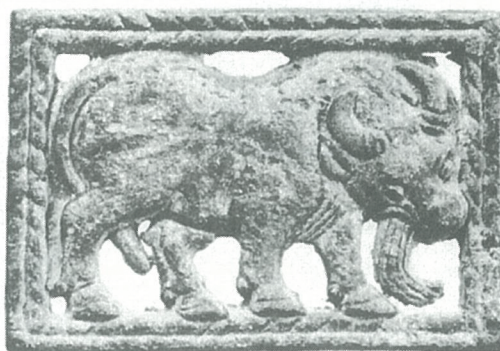
圖四六：辯紋



G. Borovka, 1928, plate 37: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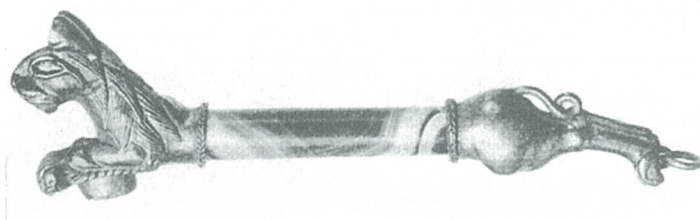


A. Salmony, 1933, plate 27:4



J. G. Andersson, 1932, plate 24:5

▼ G. Borovka, 1928, plate 37:D



圖四六：辦紋（續上頁）

李峪銅器中所刻飾之動物紋亦為寫實之作風。此種作風殆受司克泰西伯利亞文化之影響。尤以其獸體上用刻短線為飾，亦見於公元前五世紀初年司克泰墓內之出土品，如 *Scythians and Greeks* 之第145,146,147圖，及中國北部之出土物如 "Hunting Magic" 圖版二十一之4及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 圖版二十七之2（圖四七）。* 此種相同似非偶然者。

李峪銅器中之蟠螭紋附腳盤內所飾之浮雕水禽魚鱉等，徐中舒先生已指出其作風與北高加索 Kuban 地方出土公元前六世紀之金杯所飾者相同，推斷前者乃受後者之影響，⁷⁰ 於此不另贅述。

趙之代地，雖北鄰異族扼中外交通之要衝，而居代地趙人之器物「李峪銅器」，所受司克泰西伯利亞文化之影響，據管窺所及，其最顯著者不過如上之所舉。

狄柴克謂李峪銅器之無文續者製造之簡陋，絕不能與有文續者相比擬，而頗似鄂爾多斯出土之銅容器，⁷¹ 吾人亦不可遽視為前者之製造乃受後者之影響。郭沫若氏謂晚周銅器無文續者為墮落式，乃沿前期之路線益趨簡陋者，⁷² 則相當可信；因於周初及中周之銅器亦不乏無文飾者。

又李峪銅器之鼎、殷、壺、豆等多飾有立體式鳥獸，及鼎、殷、壺之耳多作環形，雖為此銅器群中相當發達引人注目之特殊作風，雖此種作風最發達於司克泰西伯利亞文化之產物；但余尚不敢強調聲言前者乃受後者影響，因中國銅器附飾立體式鳥獸，可見於殷周之際。李峪銅器多具環耳，尤以鼎耳作環形固屬殊特之作風，然皆附耳於胴外；南俄西伯利亞出土物之環耳，則多附著於器物口唇之上直立。⁷³ 中國北部出土銅容器雖有橫附環耳於胴外者，如 "Hunting Magic" 圖版十九之1, 2（圖四八），** 然此二器尚不能確斷其時代早於李峪銅器，是否乃受中國方面之影響亦未可知。李峪銅器附飾之環耳是否由早期銅器上盞狀耳所演變而來，或受外來作風之影響，仍待考古界之努力也。

* 增補圖四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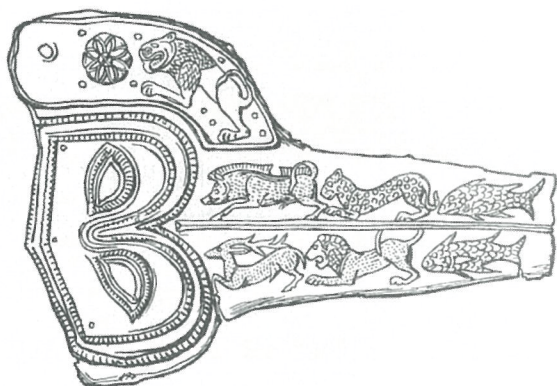
⁷⁰ 見〈古代狩獵圖象考〉，載《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

⁷¹ 見《中國古典藝術》。正勝按，*L'art Chinois Classique*, p.275.

⁷² 見《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序說》。

⁷³ 見 E. H. Minns 之 *Scythians and Greeks* 及 A. M. Tallgren 之 *Collection Tovostine*。

** 增補附圖，此二器稱銅鍍，是北方游牧民族獨具風格的容器。



E. H. Minns, 1913, fig. 147



M. I. Rostovtzeff, 1929, plate 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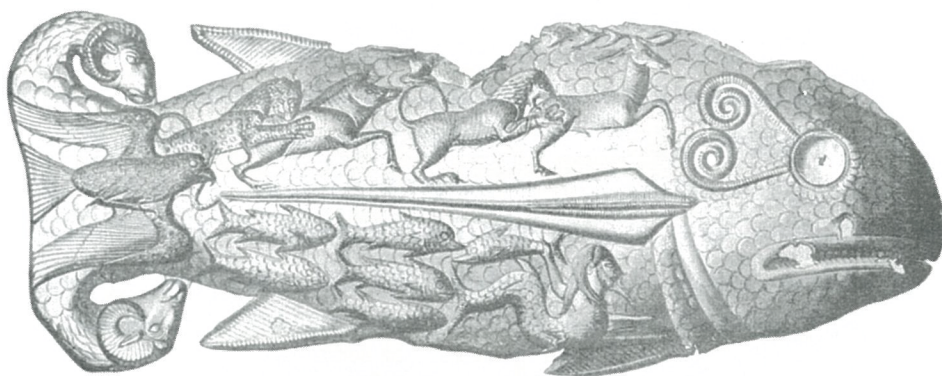


J. G. Andersson, 1932, plate 21:4



E. H. Minns, 1913, fig. 145

圖四七：中國北方與司克泰動物紋之比較



E. H. Minns, 1913, fig. 146

圖四七：中國北方與司克泰動物紋之比較（續上頁）



圖四八：銅鍑 (J. G. Andersson, 1932, plate 19:1, 2)

至若少盧劍之製造，與司克泰式劍似亦無若何直接關係。司克泰式之劍大都最長者不過二十一英吋，而以較此更短者為最多。⁷⁴ 西自南俄、波斯，東至西伯利亞、中國之內外蒙古及朝鮮，皆有此種短劍出土，故於考古學上通常稱之為波斯司克泰 (Perso-Scythian) 式劍。此種式劍古代希臘人稱之為 *akinakes* (或 *acinaces*)。⁷⁵ 此種劍名亦曾見於中國古文獻中。《漢書·匈奴傳》曰：「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逸周書·克殷解》曰：「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孔晁〈注〉：「輕呂劍名，」而《史記》輕呂作輕劍。西人夏德 (F. Hirth) 謂徑路 (King-luk)、輕呂 (King-lü) 皆現代土耳其語及諸土耳其方言中所稱兩面刃小劍 *King-rak* 之譯音。⁷⁶ 日人鳥居龍藏、原田淑人、駒井和愛皆宗其說，並謂徑路刀、輕呂劍即波斯司克泰式劍。⁷⁷ 江上波夫又以為徑路即 *akinakes* 之譯音，並就各地出土實物觀察，指出從周末波斯司克泰式劍 *akinakes* 即由西方經西伯利亞入匈奴，再傳入中國。⁷⁸ 今據希臘史家希羅多德 (Herodotus) 所言 *Sacae* 人於結盟時用 *akinakes* 撓酒血之事，亦足見江上說之可信。⁷⁹ 中國北疆頗多波斯司克泰式劍之出土，內地出土者雖大都形制稍異，而無可確斷早於春秋時者；且其年代較早者大都較短，形制亦近於波斯司克泰式之作風。故中國之有劍，或由司克泰西伯利亞文化之影響。唯少盧劍雖長不過五十餘公分，而其「鐔衛」「莖」「首」及「莖」間之「後」與一般波斯司克泰式者有別。具此形制之劍，本獨發達於中國內地，安南、朝鮮雖有與此相同者出土，然乃屬中國文化之

⁷⁴ 見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第三卷第九章或 Minns 之 *Scythians and Greeks* 第四章。

⁷⁵ 見全上。正勝按，*Scythians and Greeks*，頁71。

⁷⁶ 見 Hirth 之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第三章。正勝按，頁65-67。

⁷⁷ 見鳥居龍藏之〈論土耳其式短劍〉，載《人類學雜誌》37.9(1922) 及原田淑人、駒井和愛之《支那古器圖考·兵器篇》。正勝按，頁22-23。

⁷⁸ 見《徑路刀考》，載《東方學報》(東京)第三冊。

⁷⁹ 見 *Scythians and Greeks* 第四章。正勝按，Henry Cary 譯：*Herodotus*，VII：64云，*Sacae* 是 *Scythians*；而IV：70云，"The Scythians make solemn contracts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with whomsoever they make them. Having poured wine into a large earthen vessel, they mingle with it blood taken from those who are entering into covenant, having struck with an awl or cut with a knife a small port of the body; then, having dipped a scimeter, some arrows, a hatchet, and a javelin in the vessel, when they have done this, they make many solemn prayers, and then both those who make the contract, and the most considerable of their attendants, drink up the mixture."

分支。⁸⁰ 吾人今日似尚可斷言此種式劍蓋由中國所改進者。觀其前之楚王禽章劍之形制則知其演進之跡。至其柄部之文飾亦全屬淮式之作風，固不待言者也。

九、結語

余考察李峪出土銅器所得之管見，已如上之所述。今更將其歸納為如下數項：

（一）王涅克 (W. L. Wannick) 所得之「秦器」及現藏國內之「渾源器」本同於民國十二年出土山西渾源縣李峪村附近，同屬於一遺物群。「秦器」非出於綏遠歸化城北百餘里地方。

（二）此遺物群內之器物，除被王涅克所攜走者，亦當有少許已流外國外，其尚秘藏國內者亦不僅如余之所舉。

（三）據古文獻之載記，古墓之發見，知此遺物群當出於一古代墓葬中，而決非秦始皇祭祀山嶽之所用。由古文獻之載記，知趙武靈王墓不在渾源，故此遺物群似非趙武靈王所有。

（四）中國古代銅器自殷末至漢實具有千數百年之歷史，其形制文飾皆時時在逐漸演變中。瑞典學者曾劃出此演變之跡為「殷式」、「殷周式」、「中周式」、「淮式」及「漢式」。李峪出土銅器全屬於「淮式」。^{*}

（五）以其他「淮式」器物可斷時代者比訂李峪銅器之作成時代，似一部份當在公元前五世紀末葉，一部份當在公元前四世紀初葉，然亦不能確斷決非同時之所造。故李峪墓葬之作成，似當於公元前四、五世紀之際，最遲似亦不出四世紀初葉。

（六）由隨葬品之豐富精美及文化色彩，知此墓乃典型的戰國貴族之墓葬。由墓葬位置於恒山右脅北麓，可推知墓中主人生時居於代地。如更就代地歷史沿革考察，似可斷言此墓乃身居代地之趙國貴族所有。

⁸⁰ 見 O. Janse 之 "Notes sur Quelques Épées Anciennes Trouvées en Chine", 載《遠東古物館雜誌》第二期。

^{*} 參看 "Exhibition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 *BFEA*, No.6。所謂「淮式」，該文作者提出十一項特色，諸如器物輪廓比以前更優雅，帶有中亞（或歐亞）動物文飾的成分，S形龍紋交織，成對的圓螺旋紋被三角螺旋紋隔開，成對螺旋紋交織成S形，回紋波形飾，線紋裝飾，褶紋裝飾，點、鉤、四葉成一環等裝飾。當時認為這類青銅裝飾多出於淮河流域，故名「淮式」。現在看來，「淮式」和「秦式」的名稱一樣地不合適。

（七）當時代地北鄰沐浴於司克泰西伯利亞文化之異族，又居中外交通之要衝，而李峪出土銅器所受此種文化之影響並不若少許外人所言之甚，最顯著者亦不過馬具及少許動物紋、繩紋而已。

李峪墓葬埋藏品之豐富，決不亞於同年在新鄭之發見，不幸皆分散於國內外。余所得見者僅其一部份銅器之圖影，其餘之銅器、陶器、骨角器、漆器、玉器及子安貝等皆與本題有深切之關係，而竟不得見，故一切論斷自覺未免過早，亟盼博雅之指教。又外人因研究李峪出土銅器而生「秦式」之說，最近瑞典學者因喀爾白克（O. Karlbeck）在淮水流域獲得大批此式器物，因更名為「淮式」。此「淮式」之區劃雖與李峪銅器之研究有關，但已屬周末全部銅器之研究，余不願於本題內更有所論斷。

（本文於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通過刊登）

引用書目

小川琢治

- 1940 〈穆天子傳研究〉，《支那歷史地理研究續集》，東京：弘文堂，昭和十五年第四版。

王國維

- 1927 〈王子嬰次廬跋〉，《觀堂集林》卷十八，海寧王氏排印石印本。

安特生 (J. G. Andersson) 著、樂森瑋譯

- 1925 〈甘肅考古記〉，《地質專報》甲種第五號，北京：農商部地質調查所。

江上波夫

- 1932 〈徑路刀考〉，《東方學報》（東京）第三冊，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方研究所，昭和七年。

吳其昌

- 1931 〈虜氏鐘補考〉，《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5.6，北平。

李 濟

- 1933 〈殷虛銅器五種及其相關之問題〉，《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上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北平。

原田淑人、駒井和愛同輯

- 1932 《支那古器圖攷・兵器篇》，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昭和七年。

唐立庵

- 1932 〈虜羌鐘考釋〉，《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6.1，北平。
1934 〈壽縣所出銅器考略〉，《國學季刊》4.1，北平：國立北京大學出版組。

徐中舒

- 1931 〈陳侯四器考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北平。
1932 〈虜氏編鐘圖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七，北平。
1935 〈古代狩獵圖象考〉，《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北平。

高去尋

- 1933 〈殷商銅器之探討〉，《史學論叢》第一冊，北平：北京大學歷史系潛社。

高去尋

梅原末治

- 1931 〈所謂秦銅器に就いて〉，《史學》10.3，東京：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三田史學會，昭和六年。
- 1933-35 《歐米蒐儲支那古銅精華》，大阪：山中商會，昭和八年至十年。
- 1938 《明斯教授頌壽記念：古代北方系文物の研究》，京都：星野書店，昭和十三年。
- 1944 〈在歐洲的支那考古學上的資料與其研究〉，收入《支那考古學論攷》，東京：弘文堂書房，昭和十九年。

郭沫若

- 1931 〈新鄭古器之一二考核〉，《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下冊，上海：大東書店。
- 1932 〈虜羌鐘銘考釋〉，《金文叢考》，東京：文求堂書店，昭和七年。
- 1932 〈韻讀補遺〉，《金文叢考》，東京：文求堂書店，昭和七年。
- 1933 〈金文續攷〉，《古代銘刻彙攷・二》，東京：文求堂書店，昭和八年。
- 1934 〈壽縣所出楚器之年代〉，《古代銘刻彙攷・續編》，東京：文求堂書店，昭和九年。
- 1935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東京：文求堂書店，昭和十年。

鳥居龍藏

- 1922 〈土耳其式短劍に就て〉，《人類學雜誌》37.9，東京：第一書房，日本人類學會編，大正十一年九月。

森鹿三

- 1935 〈晉・趙の北方進展と山川の祭祀〉，《東洋史研究》1.1，京都：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會，昭和十年。

鄒 安

- 1916 《周金文存》（附補遺六卷），上海：倉聖明智大學，民國五年第三版。

劉 節

- 1931 〈虜氏編鐘考〉，《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5.6，北平。
- 1932 〈跋虜羌鐘考釋〉，《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6.1，北平。
- 1935 〈壽縣所出楚器考釋〉，《楚器圖釋》，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

劉體智藏、鮑鼎編

- 1934 《善齋吉金錄》，廬江劉氏影印本，民國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

濱田耕作著、汪馥泉中譯

- 1931 《東亞文化之黎明》，上海：黎明書局。

羅振玉

- 1929 《丁戊稿》，排印本。
- 1930 《貞松堂集古遺文》，石印本。
- 1931 《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上虞羅氏遼東石印本。
- 1934 《貞松堂集古遺文·續編》，蟬隱廬石印本，民國二十三年。

關百益輯、何日章校

- 1929 《新鄭古器圖錄》，上海：商務印書館。

Andersson, Johan Gunnar

- 1925 "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 *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Series A, No.5
- 1929 "Der Weg Über die Steppen,"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FEA)*, Stockholm, No.1.
- 1932 "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 *BFEA*, No.4.
- 1933 "Selected Ordos Bronzes," *BFEA*, No.5.

Arne, T. J.

- 1933 "Die Funde von Luan P'ing und Hsuan Hua", *BFEA*, No.5.

Bongard-Levin, G. (Moskau) & Kyrieleis, H. (Berlin)

- 1997 *Steppenvölker Eurasiens*, Moskau: Eurasien-Abteilung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 Institut für Allgemeine 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entrum für Erforschung Studien der Alten Zivilisationen.

Borovka, Gregory

- 1928 *Scythian Art*,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Prof. V. G. Childe;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Childe, Vere Gordon

- 1926 *The Aryans : a Study of Indo-European Origins*, London : K. Paul, Trench, Trubner; New York: A. A. Knopf.

de Tizac, H. d'Ardenne

- 1926 *L'art Chinois Classique*, Paris: Henri Laurens.

Editors of *BFEA*

- 1934 "The Exhibition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 *BFEA*, No.6.

Fenollosa, Ernest F.

- 1921 *Epoque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London: W. Heinemann.

Herodotus, translated by Henry Cary

- 1912 *Herodotus*, London: G. Bell and Sons.

Hirth, Friedrich

- 1908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to the End of the Chou Dynas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Janse, Olov

- 1930 "Quelques Antiquités Chinoises d'un Caractère Hallstattien," *BFEA*, No.2.
1930 "Notes sur Quelques Épées Anciennes Trouvées en Chine," *BFEA*, No.2.

Karlgren, B.

- 1934 "On the Date of the Piao Bells," *BFEA*, No.6.
1937 "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 *BFEA*, No.9.

Koop, Albert J.

- 1924 *Early Chinese Bronzes*, London: Ernest Benn Limited.

Minns, Ellis Hovell

- 1913 *Scythians and Greek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arker, Edward Harper

- 1924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 London: K. Paul, Trench, Trubner; New York: A. A. Knopf.

Rostovtzeff, Michael Ivanovitch

- 1922 *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7 *Inlaid Bronzes of the Han Dynasty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 Paris, Brussels: G. Vanoest.
1929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H. Mil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almony, Alfred

- 1933 *Sino-Siberian Art in the Collection of C. T. Loo*, Paris: C. T. Loo, Publisher.

Sirén, Osvald

- 1928 *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 — the Prehistoric and Pre-Han Periods*, London: Ernest Benn Limited.

Tallgren, A. M.

- 1917 *Collection Tovostine des Antiquités préhistoriques de Minoussinsk*, Helsingfors.

White, William Charles

- 1934 *Tombs of Old Lo-yang*, Shanghai: Kelly & Walsh Ltd.

Yetts, Walter Perceval

- 1926 "Discoveries of the Kozlov Expedition,"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April.

A Note on Kao Chu-hsun's "Li-yü Bronzes and Related Topics"

Tu Cheng-she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Li-yü Bronzes and Related Topics" (李峪出土銅器及其相關之問題) was the thesis written by my teacher Professor Kao Chu-hsun (高去尋) when he graduated from the Peking University in 1935. It was supposed to be published in 1938 when the university celebrated its fortieth anniversary. But by that time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had retreated to the Southwest. Printing conditions were poor. And as this article did need to be illustrated with plates, it could not be published.

More than sixty years have since elapsed and Professor Kao passed away almost eight years ago. I now reorganize and publish the manuscript he left behind, partially because of my personal feelings for my teacher, but mainly because of its academic value. His arguments are still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modern-day scholars. The most important monograph on the Li-yü bronzes has so far been *The Studies of Warring States Style Bronzes* (戰國式銅器の研究) by Sueji Umehara. This book was published one year after Professor Kao's article was written. However, the academic world recognizes only Sueji Umehara's article and not Kao Chu-hsun's unpublished article.

Li-yü is a small village at the northern foot of Mt. Heng (恒山) in Hun-yuan District (渾源縣), Shansi Province. In the summer of 1923, heavy rain uncovered a batch of cultural relics, among which the most numerous and noteworthy were bronzes. French antique dealer W. Léon Wannieck, upon hearing the news, immediately purchased these bronzes, brought them back to Paris, and showed them at Musée Cernuschi. The show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Mt. Heng is the Northern Sacred Mountain of the Five Sacred Mountains in China. According to local legend, the First Emperor of Ch'in offered sacrifice here in 219 B. C. Wannieck thus believed that these bronzes of Li-yü were the ceremonial vessels used in this sacrifice and called them "the Ch'in bronzes." European scholars in Oriental Studies, such as H. d'Ardenne de Tizac (in *L'art Chinois Classique*), O. Sirén (in *A History of Early Chinese Art—the Prehistoric and Pre-Han Periods* Vol.I) and A. J. Koop (in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all adopted his view. This was a new and improved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 If it could be accepted, then the previous rough division of bronzes into periods—with Han bronzes immediately following Chou bronzes—should be revised.

In the past, the Chinese bronzes studied by scholars mainly were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s or purchased at antique markets. Their provenance was seldom known and their excavation records were completely lacking. After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IHP) of the Academia Sinica was established in 1928, it carried out excavations at Anyang in northern Honan—at that time the speculated capital of the Yin Dynasty. Thus, the first detailed records of scientific excavations came into existence. Bronzes were found at Anyang in 1929. Around that time, some groups of bronzes were discovered at several other sites. Scientific records for their excavations were lacking, but at least their provenance was known. Thus, although they are incomparable to the excavated bronzes of IHP in academic value, they surpassed that of the handed-down bronzes. They often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alike. The most important among these bronzes were found at Li-yü Village (1923), Li-shih-yüan at Hsin Cheng (新鄭李氏園, 1923), Chin-ts'un at Loyang (洛陽金村, 1928), and Chu-chia-chi at Shou District (壽縣朱家集, 1923 and 1933). Generally speaking, before 1950, aside from the bronzes excavated by IHP, scholars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se few batches of bronzes, especially the bronzes from Li-yü. Thus, Professor Kao's studies of the Li-yü bronzes in 1935 are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Kao's article has three parts. Part I discusses the use of these bronzes. He drew on ancient literature to prove that the First Emperor of Ch'in had never been to Hun-yüan and had never offered sacrifice to Mt. Heng. So the "Ch'in bronzes" theory could not be established. At that time, a number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scholars entertained other theories. Some of them argued that these bronzes belonged to the Kingdom of Chao, either as the personal property of King Wu-ling of Chao (趙武靈王) or as ceremonial vessels used by the aristocrats of the Kingdom of Chao in their sacrifices to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Kao objected to all these theories and refuted them one by one in his article. Kao believed that the Li-yü bronzes were sacrificial burials of tombs. According to modern archaeological knowledge, he was absolutely correct.

Part II of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typology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of the Li-yü bronzes,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art history. Nineteen types are listed in traditional terminology, such as *ting*-cauldron, *tou*-dish, *i*-washbasin, *p'an*-plate and so on. The twelve

different decorative patterns include dragon pattern, *t'ao-t'ieh*-mask pattern, animal pattern, rope pattern, leaf pattern, floral pattern, rhombic pattern, shell pattern, and so on. This analysis of decorative patterns was advanced for its time.

The purpose of Part II was to serve as the basis for Part III, which discusses two problems: 1. the date of the Li-yü bronzes, and 2. the external cultural influences as reflected by the Li-yü bronzes. The author compar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ypology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of the Li-yü bronzes with those of the above-mentioned Hsin Cheng, Loyang, and Shou District bronzes and analyzed the various theories. H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 large portion of the Li-yü bronzes were probably made in the fourth century B. C., whereas a small portion were made at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 C. As a whole, they were made between the fifth and the fourth centuries B. C.

The so-called “external culture” refers to the Scythian or Scytho-Siberian Culture often discussed by scholars in Oriental Studies. Its corresponding technology in China was that of the Ordos bronzes. And their common feature is the animal style art. Ever since E. H. Minns (as in his *Scythians and Greeks*), M. I. Rostovtzeff (as in his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 G. Borovka (as in his *Scythian Art*), J. G. Andersson (as in his “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 and A. Salmony (as in his *Sino-Siberian Art*), this has been a hot issue among scholars in Oriental Studies.

In 1935, Professor Kao participated in these discussions citing the most advanced research results available at the time. He compared the decorative patterns of the Li-yü bronzes with those of the artifacts unearthed at Kuban, Minussink, and some other places and argued that the Scytho-Siberian art certainly had some impact on the art of northern China. He explained that this was because Li-yü was located on the communication line between Scytho-Siberia and China.

I feel that Professor Kao's article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among the discourses of the Li-yü bronzes in its breadth, depth, and comprehensivenes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new scholars” in China generally had very broad views about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They paid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regions. Typical examples in this regard include Li Chi (李濟)'s analysis of the bronzes found at the Ruins of Yin, and Hsu Chung-shu (徐中舒)'s study of hunting images on bronze vessels. Kao's article carried on this tradition. The so-called

“Scytho-Siberian Style” is a rather sweeping concept. However, since ancient times, cultural exchanges among the tribes of the Eurasian steppe and between these tribes and China have been frequent. And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bronze technology north of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could contain certain non-Chinese elements, especially in places like Li-yü which were located near the Great Wall.

During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so-called “Li-yü Style Bronzes” were unearthed from twenty to thirty localities. The accumulation of large quantities of source materials has enabled u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is type of bronzes. Some scholars have divided them into three categories—“the Chin Style”, “the Yen Style,” and “the Northern style.” Others have divided them into “the Yen bronzes,” and “the Tai bronzes.” Their studies are more sophisticated than those of their predecessors. But contemporary Chinese scholars, in discussing this topic, often neglected the style of study of the 1930s. In their search for the origins of these bronzes in the Yin and Chou culture or the impact of these bronzes o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es of the Chinese kingdoms, they often overlook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cultures of the northern steppe.

From a present perspective, this problem is of course more complicated than could be perceived in the 1930s. I do not agree with the arbitrary use of the sweeping “Scytho-Siberian” concept to generalize. But would it be right to limit the scope of our discussion to the south of the Yen Mountains and the Great Wall? Professor Kao was cautious in stating that the Li-yü bronzes were in some little ways influenced by external elements. When we look at this statement today, should we consider it too conservative or too bold? I am afraid that this question cannot be answered until an overall review is done on the cultural changes of the kingdoms north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steppe belt during the Eastern Chou Dynasty, i. e., between the eighth and the third centuries B. C.

The Li-yü bronzes belonged neither to the First Emperor of Ch'in (221-210 B. C.) nor to King Wu-ling of Chao (325-299 B. C.). Professor Kao put this burial at the turn of the fifth century and the fourth century B. C. According to what we know today, this conclusion, although not exactly correct, is not far from the truth. There has been no precise and undisputed evidence for the dating of the Eastern Chou Dynasty bronzes. Among the above mentioned few batches, those from Hsin Cheng and Chin-ts'un do carry inscriptions on them, but studies on these bronzes regarding people and events have only resulted in

generally acceptable views and not absolute, final conclusions. The conclusions reached from the excavations of Chung-chou-lu, Loyang (洛陽中州路), although used since 1960 as criteria for dating unearthened objects, can only have relative significance so far as dates are concerned.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because of personal views or choices, some scholars have speculated that the Li-yü bronzes were as early as middle or late Spring-Autumn Period (the end of the sixth century B. C.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fifth century B. C., e. g., Tao Cheng-kang 陶正剛). Others put them at late Spring-Autumn Period (beginning of the fifth century B. C., e. g., Tsou Heng (鄒衡) or as late as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second half of the fifth century B. C. or later, e. g., An Chih-min 安志敏).

The publication of the excavation report on the Houma (侯馬) bronze foundry site in southern Shansi Province in 1993 had some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ating of the Li-yü bronzes. Clay molds and models similar to or the same as those used in casting part of the Li-yü bronzes (i. e., the so-called "Chin Style") have been found at the bronze foundry site at Houma—mainly at Layer IV and Layer V of the site. Lacking concrete evidence for dating purposes, the report is based on the overlapping strata and the typology of the potteries. It divides the site into three periods and six layers. And the absolute date of this site could only be roughly estimated from the fact that Houma was the capital of the Kingdom of Chin in its last phase.

In 585 B. C. Hsin T'ien (新田, modern Houma) became the new capital of Chin. The ducal house of Chin declined around 530 B. C. In 453 B. C., as a result of the struggle among its aristocrats, the Han (韓), Chao (趙), and Wei (魏) families annihilated the Chih (智) clan. In 403 B. C. these three families divided Chin between them and the Duke of Chin lost his authority. In 376 B. C. the title of the duke was cancelled. Probably the Houma bronze foundry site terminated at this time—perhaps the end of Layer VI. There are no bronze foundry remains in Layer I of the Houma site. Suppose Houma became the capital of Chin at the time corresponding to Layer II of the site. Since the report says that the span of each layer is similar, then each layer should cover about forty years and Layers IV-V fall roughly between 500-420 B. C. Although this is only a rough estimate, it can still more or less serve as a standard for dating the Li-yü bronzes. According to this standard, the middle to late Spring-Autumn Period is probably a little too early as the date of the Li-

yü bronzes. Some western Sinologists have recently dated these bronzes at late sixth century to early fifth century B. C. (e. g., Jenny So, see *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 475). But the date of fifth century B. C. (e. g., Alain Thote, see *Rites et Festins de la Chine Antique Bronzes du Musee de Shanghai*, pp. 157-160) is probably more compatible with the strata at the Houma bronze foundry site.

The so-called “Li-yü Style” is not limited to Layer IV or Layer V of the Houma bronze foundry site. It also extends to Layer VI. And its so-called “Yen Style” part has not yet been precisely dated. So, these new speculations are only comparatively more acceptable views. Roughly speaking, the Li-yü bronzes could not be earlier than 500—450 B. C. If so, the date Professor Kao gave to the Li-yü bronzes is perhaps a little late, but no more than fifty years late. For the 1930s, such a conclus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very precise.

There are three parts in my reorganization: 1. rearranging the order of the plates for the Li-yü bronzes, 2. adding some plates, and 3. compiling supplementary notes, a bibliography, and this note.

Most of the plates published here are re-photographed from *The Studies of Warring States Style Bronzes* by Sueji Umehara. A small portion are new photographs supplied by the Shanghai Museum and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ese History-Peking. I am very grateful to these two museums. A comparison of new and old photographs indicates that some of these collected items have been repaired.

The new plates are taken from the source materials used by Borovka, Salmony, and Andersson. There is no plate in Kao’s original manuscript to illustrate hi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Li-yü bronzes and the Scytho-Siberian Culture. My addition will make it easier for readers to understand Professor Kao’s grounds of argument.

Additional references were needed. It was customary for scholars in the 1930s to give only the title of their reference books. I checked the original books Professor Kao used and added page numbers for them to conform to the style of current scholarly works.

Finally, I recommend Professor Kao’s article a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scholars interested in the Li-yü bronzes or the ethn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n the Asian steppe. I also hope my article will serve as a bridge between an article written sixty years ago and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Li-yü bronzes and will also help readers better appreciate the academic significance of Professor Kao’s article.

高師〈李峪出土銅器及其相關之問題〉 遺稿整理後記

杜正勝*

高師曉梅（去尋）先生北京大學畢業論文〈李峪出土銅器及其相關之問題〉，民國二十四年（1935）六月完成，二十七年修訂，原來預備在「慶祝北京大學四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刊布。時值抗戰方殷，主編者認為「港滬淪陷，印刷發生障礙，所附圖版均不能插入，勉付油印，殊貶損原作之精詣」，於是抽換另一論文¹而〈李峪銅器〉一文遂延宕六十餘年，至今乃得以問世。

高先生學術真正的興趣可能是中國北方民族文化與藝術的研究，在我寫的幾篇紀念他的文字都提到這點，這是我從他問學將近二十年獲得的整體印象和感受。但這課題，當他在世時我並沒下過工夫，高先生或難免有「對牛彈琴」的遺憾吧？在他過世前兩三年（約1988-89），一次論學後，他將〈李峪銅器〉的原稿交給我，也沒說什麼，大概希望我讀讀而已。

他去世後，我才動念研究歐亞草原帶古代民族與文化的交流，於是查考資料，閱覽眾說，益發覺得李峪銅器這個課題，高先生六十年前的論說在當時固稱尖端，即使今日仍極具參考之價值，然而因為他的論文一直沒有發表，致使談論李峪銅器者，皆不知有高去尋其人。

高先生以此篇論文獲知於傅斯年所長而與史語所結緣一生，²去歲適逢史語所七十周年，我乃決定整理此文在今年的《集刊》七十周年紀念專號上發表，此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¹ 參高師〈漢崖墓題識“內”字之一解〉，《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油印論文》（昆明：國立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1943）。

² 參杜正勝，〈通才考古家高去尋〉，杜正勝、王汎森主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677-707。

固非純循私情，乃有學術之公義在焉。不論三〇年代的學術史，即使在今九〇年代之末，高先生這篇論文仍然值得我們注意。

抗日戰爭之前，中國古代青銅器之出土對古史產生最大衝擊者，當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河南北部，包括安陽、濬縣、汲縣和輝縣等商周遺址的科學發掘。其次比史語所早或與之同時，未經嚴肅考古而流入古董市場的新出青銅器，對古史研究亦極重要，主要有四批，即一九二三年的渾源李峪村和新鄭李氏園，一九二八年的洛陽金村和一九二三與一九三三年的壽縣朱家集。它們給中國古代史及青銅器學帶來大量的新材料，引起國內外學者關注，相率研討新問題，提出新理論。

關於李峪銅器的問世，高先生的文章中已有交代，這裡不再重覆。巴黎展覽後，續有學術性的報導，³ 然而對這批資料用力最深，蒐集最全者，當推梅原末治一九三六年五月出版的《戰國式銅器の研究》，⁴ 舉凡流散於法、德、英、瑞典和美國的公私收藏，以及殘留在中國境內者大抵蒐羅殆盡。同年六月商承祚雖然也出版《渾源彝器圖》，⁵ 卻遠遜於梅原氏。商氏之書係將山西并州大學教授時伯齊提供的李峪銅器照片18幀據為己有，⁶ 外加梅原末治所編⁷ 的9幀，共計27幀而成，只記錄簡單的基本資料，沒有展開學術討論。高先生寫作〈李峪銅器〉早於梅原的《研究》與商氏的《彝器圖》，他用的資料係留存在中國的18幀（與商氏同），與歐洲學者出版的五種書籍收集所得19幀，計37幀，其視商氏《彝器圖》遠為精詳，與梅原的《研究》亦相去不遠。然而中國學者論李峪銅器，所憑藉的資料多知有商書而不知有高文；世界學者也多引述梅原氏，無人提及高先生。

一九二三年李峪到底出土多少銅器或遺物，恐怕永遠無法有精確的數字。梅原氏曾推測50餘品，⁸ 近來有人把幾種著錄合併統計，而謂完整銅器有81件之多，⁹ 這個數目因為根據的資料頗有重覆，故不可信。據我估計，容器大概不會超過40件（含殘器），武器、車馬器及其他約30多品。高先生的研究集中在容

³ Georges Salles, "Les Bronzes de Li-yu," *Revue des Arts Asiatiques*, Tom VIII, No. III, 1944.

⁴ 梅原末治，《戰國式銅器の研究》，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報告第七冊，1936。

⁵ 商承祚，《渾源彝器圖》，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叢刊甲種，1936。

⁶ 參張鎮，《渾源彝器拾遺》，《山西文物》1982.1；商承祚，《渾源彝器圖·序》。

⁷ 梅原末治，《歐米蒐儲支那古銅精華》（大阪：山中商會，1933-1935）。

⁸ 梅原末治，〈所謂秦銅器に就いて〉，慶應義塾大學三田史學會《史學》10.3(1931)。

⁹ 李夏廷，〈渾源彝器研究〉，《文物》1992.10。

器，他引用的資料基本上已接近所知的總數了。附帶說明者，我的估計數字不包括六〇年代張頌的少量徵集，和七〇年代山西省考古所新發掘的幾件。¹⁰ 張氏徵集上距出土已經四十年，是否即是一九二三年那個墓坑的東西，很難斷言；至於山西考古所的新發掘當然與一九二三年的無關。

就我知見所及，關於李峪銅器的研究，論方面之廣、角度之多、論述之深，直到今日，高先生這篇論文恐怕還是其中的翹楚。二〇年代歐洲學者耳食秦皇祭恒山的地方傳言，而有「秦器」之說。雖然梅原末治在不知「李峪」這個地名時就反對秦器說，¹¹ 改稱為戰國銅器（參上引〈論所謂秦銅器〉），但高先生此文根據文獻證明秦始皇從沒到過渾源，也沒祭拜過恒山，才得以釜底抽薪，徹底解決。繼秦器說之後，又有趙器說，徐中舒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厲氏編鐘考釋》推測李峪銅器是趙武靈王的遺物，¹² 高先生未點名地加以反駁。主趙器說者當時尚有別人，如森鹿三一九三五年十月發表在《東洋史研究》創刊號的〈晉・趙の北方進展と山川の祭祀〉，認為李峪銅器是趙氏崇祀山川的遺物。這篇文章出版晚於高先生的寫作，他當然不可能看到。高先生的結論是這批遺物固非秦器，也非趙器，與祭祀山川亦無關，而是墓葬之物。今日累積的考古知識已能輕易地判斷為墓葬，不過當時主張墓葬說，我雖不敢說高先生是第一人，至少是非常先進的創見，即使對李峪用功甚深的梅原末治也到一九三六年的《戰國式銅器の研究》才提出這種說法（頁7），比高先生還晚一年多。

此文有相當的篇幅討論李峪銅器的形制與文飾，這是一種藝術史的研究法，在當時中國的學術界也算是相當先進的研究取向。因為這種取向的啓發，他乃將李峪銅器放在更寬廣的背景探討與北西域外的關係，即所謂「司克泰・西伯利亞」(Scytho-Siberian) 的課題。

二十世紀中國新學術的第一代學者研究中國歷史文化，他們的視野多非常寬廣，能注意中國與域外的關係，與我們現在所論之課題相關者，如李濟殷墟銅器的分析，¹³ 或徐中舒的狩獵圖像考，¹⁴ 皆是典型的例子，高先生這篇論文即是承

¹⁰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陶正剛），〈山西渾源縣李峪村東周墓〉，《考古》1983.8。

¹¹ 梅原寫〈論所謂秦銅器〉一文時，皆稱LI-Yü，「李峪」之名是森鹿三告訴他的，見梅原〈LI-Yü位置の補正〉，《史學》11.3(1932)。

¹² 徐中舒，《厲氏編鐘考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七，1932。

¹³ 李濟，〈殷墟銅器五種及其相關之問題〉，《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上，1933。

¹⁴ 徐中舒，〈古代狩獵圖像考〉，《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1935。

襲這種學風。雖然所謂「司克泰·西伯利亞」風格是相當籠統的概念，但北方草原帶的民族文化交流自古以來就很頻繁，黃河流域以北的戰國青銅工藝，尤其像李峪這種處於長城內外地帶的地方，含有非華夏的外來文化成分並不令人意外。最近幾十年所謂「李峪式」青銅器出土不下二、三十處，累積大量的材料，使我們對這類銅器有更深入的認識，有人分爲「晉式」、「燕式」和「北方系」三種，¹⁵ 也有人分作「燕器」和「代器」。¹⁶ 這些工作雖然比前人細密，但現在中國學者討論這個問題，反而不太注意三〇年代的學風，偏重於尋找殷周的根源，或在當時的華夏國家推求影響，與北方草原帶的關連往往相對地忽略。現在看這問題當然遠比三〇年代複雜，我也不贊成動輒用那個籠統的「司克泰·西伯利亞」的概念來概括，但如果只限在燕山和長城以南，會是一個正確的討論場域嗎？高先生說李峪銅器有少許外來影響，論斷是謹慎的，在今天看來是嫌太保守，還是太大膽呢？恐怕只有全面清查東周時代，即西元前八世紀至三世紀之間，黃河以北諸國的文化變化及其與草原帶的關係才好評論。

李峪銅器既不屬於西元前三世紀晚期的秦始皇（221-210 B.C.），也不屬於西元前四世紀末的趙武靈王（325-299 B.C.），高先生定此墓葬在西元前五、四世紀之際，根據今天的知識，這個結論可以說雖不中亦不遠矣。東周銅器的斷代，精確而無異議的證據並不多，上述幾批重要出土器，新鄭和洛陽金村有銘文，但人與事的考訂也只有一般比較可以接受的看法，不敢說有絕對的定論。後來洛陽中州路的發掘，結論雖然多做爲別地方出土物斷代的標尺，但也只有相對的時間意義而已。在這樣的條件下，由於個人的體系或取捨，李峪銅器年代的推測乃有早到春秋中晚期（如陶正剛），¹⁷ 或春秋晚期（如鄒衡），¹⁸ 也有晚到戰國初葉的（如安志敏）。¹⁹

九〇年代侯馬鑄銅遺址的報告問世，²⁰ 對李峪銅器的年代判定起了一些積極作用。李峪銅器有一部分（即所謂的「晉式」）可以在侯馬鑄銅遺址找到類似或相同的陶範和陶模，大多屬於遺址的IV段到V段。因爲遺址中未發現明確紀年的

¹⁵ 李夏廷，〈渾源彝器研究〉，《文物》1992.10。

¹⁶ 趙化成，〈東周燕代青銅容器的初步分析〉，《考古與文物》1993.2。

¹⁷ 參陶正剛，〈山西渾源縣李峪村東周墓〉，《考古》1983.8。

¹⁸ 參鄒衡，〈商周考古〉，頁258。

¹⁹ 參安志敏，〈河北省唐山市賈各庄發掘報告〉，《考古學報》6(1953)。

²⁰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鑄銅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材料，該報告據地層疊壓和陶器形制分作三期六段，其絕對年代只能以侯馬做為晉國晚期之都城而約略估計。西元前585年晉遷都新田（今之侯馬），約530年晉公室衰落，453年韓趙魏滅智氏，403年三家分晉，376年晉亡。侯馬第 I 段未見鑄銅遺物，假設做為都城是從II段開始，報告說每段時間相差不遠，則一段約40年，那末IV-V段大約在西元前500-420年之間。這雖然也只是一種粗估，但多少可以做為推考李峪銅器年代的一種準則。依此準則，所謂春秋中、晚期之說（會不會受那座無法精確斷年的金勝村所謂趙卿墓²¹ 的暗示？）可能稍稍偏早，西方漢學界最近的說法，有人定在西元前六世紀晚期到五世紀早期，²² 但恐怕不如定在西元前五世紀²³ 比較符合侯馬鑄銅遺址的層位吧。所謂「李峪風格」並不限於侯馬鑄銅遺址IV或V段，也延續到VI段，而其屬於所謂「燕式」的部分尙未有更進一步的斷年，所以這些新推測也只是比較可以接受的想法而已。大體而言，李峪銅器可能不會早於西元前五世紀或其上半（即500-450 B.C.）。那麼高先生給李峪銅器所下的年代，或嫌略遲，但最多恐怕不會超過50年吧。三〇年代有這種結論，應該是非常精確了。

最後必須指出的，高先生此文引用高本漢 (B. Karlgren) 「淮式」(Huai Style) 的概念，算是一個小瑕疵。「淮式」是三〇年代中國青銅器學的新說，把原來籠統的「殷式」、「周式」和「漢式」的分期更加精密化。按照高本漢的分期法，在「中周式」（西元前九至七世紀）之後到漢帝國成立之前，約七或六世紀到三世紀間的銅器屬於淮式，²⁴ 相當於梅原末治的「戰國式」（含蓋春秋晚期）。高本漢理解的「淮式」特徵，²⁵ 毋寧有相當多今日所謂晉系或北方系的成分，因為他最先獲知的材料是一九二三年瑞典人 O. Karlbeck 得自壽縣朱家集的遺物，遂創造這個南北扞隔的名詞。當時高先生在這種新概念的架構下論述，是一種進步，雖然用了一個今日看來甚不妥當的名詞，但對李峪銅器內容的討論並無影響。

²¹ 參陶正剛、侯毅、渠川福，《太原晉國趙卿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²² Jenny So, *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Arthur M. Sackler Foundation, 1995), p.425.

²³ Alain Thote, *Rites et festins de la Chine antique* (Paris-Musées, 1998), pp.157-158.

²⁴ 參 "The Exhibition of Early Chinese Bronz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6: 90-92.

²⁵ 同註24，頁93。

我的整理工作主要分三方面，第一，重新編排李峪銅器的圖版，現在發表的圖版係大部分根據梅原末治的《戰國式銅器の研究》重新翻拍，一小部分利用上海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提供的新照片，重新排定圖版的順序，我對這兩個博物館特別感謝。這些收藏品有的經過修補，透過新舊照片的比較可以看得出來。其次，增補比較研究的圖版，高先生的原稿對於「司克泰·西伯利亞」的比較研究，當時沒有附圖，我從 Borovka, Salmony, Andersson 等人引用的資料增補圖版，讀者可以比較容易地了解高先生的論據。第三，補注和製作書目。當時中國學者行文的方式引書往往只舉書名，我核對高先生引用的書，補齊頁碼，以符合現在學術論文的規範。

最後，我認為對李峪銅器或亞洲草原帶之民族與文化交流有興趣的學者，這篇論文是值得參考的文獻，而這篇後記我也希望可以為六十多年前的著作和當今的研究築起一道橋樑，幫助讀者了解高先生這篇論文的學術意義。